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公共事務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貪腐感知如何影響公民參與：以政治效能感為中介變數的定

群追蹤分析

How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fluences Citizen Participation: A

Panel Study with Political Efficacy as the Mediator

徐子傑

Tzu-Chieh Hsu

指導教授：郭銘峰 博士

Advisor: Ming-Feng Kuo, Ph.D.

中華民國 112 年 7 月

July, 2023



誌謝

這篇論文得以順利完成，首先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郭銘峰老師。在論文主題尚未確定之前，由於擔任老師的研究助理，我對廉政相關研究議題就已經有了一定的知識積累，進而促使我能夠確定研究主題的前進方向。在我正式開始動手撰寫論文後，從研究問題的發想、相關文獻的爬梳、分析資料的選擇、分析結果的詮釋，再到分析的貢獻與意涵方面，都與老師相當密集地討論每個研究的環節，使我在研究上走錯方向時能夠及時導正回來，能夠將精力投注在正確的方向上。而在論文寫作之外，在日常生活、做事態度、以及如何與他人有效地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上，老師也給予了相當多的指導。由於老師的指導，使我在許多方面都獲得了成長，讓我意識到碩士生涯帶給我的收穫，確實有其獨特的價值所在。

其次，感謝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所提供的寶貴資料，使我能夠以定期追蹤的角度進行研究，對過去的實證結果作進一步的補充。在論文修改完善方面，要感謝擔任我的論文口試委員的莊文忠教授與黃心怡教授，以及在中國政治學會年會上給予我許多重要研究建議的吳重禮教授和吳文欽教授，四位老師在理論架構和分析方法上都給予我相當重要的建議，使我在論文寫作上能夠進一步完善研究的相對薄弱之處。

再次，感謝公事所的同學們，不論在研究上還是日常生活中，與你們的交流總是讓我輕鬆且愉快，同學們所舉辦的活動也是我的寶貴經歷，使我的碩士生涯不至於太過單調沉悶，也感謝同為郭銘峰老師研究團隊的學長姐、同學和學弟妹們，在我的論文寫作和助理工作中給予了相當多的支持。

最後，感謝我的父母、妹妹和三位多年好友瀚中、柏升與家睿，在碩士生涯中提供給我相當多的經濟與情感支持，讓我也能夠沒有後顧之憂地完成碩士學位。

謹以此文，獻給在我的碩士生涯中曾經幫助過我的人們。



摘要

在現代民主國家中，反貪與促進公民參與都是公共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政府也在這方面做出了相當多的努力，包括修訂反貪法規制度、拓展公民參與的管道及賦權培力等，我國政府在清廉度和政治權利方面也多受國際組織評鑑所肯定。近年來，國際上關於公民參與的研究文獻越來越重視貪腐因素，並且實證結果顯示公部門貪腐對公民參與具有影響力。然而，目前我國對於貪腐因素對公民參與的影響研究相對較少，且定群追蹤研究的比例也相對罕見，因此本研究計劃利用台灣政經傳播中心 (TIGCR) 提供的 2018 至 2020 年民眾定群追蹤資料 (panel data)，探討民眾的貪腐感知對其公民參與的影響。

本研究認為政治效能感在解釋貪腐感知如何影響公民參與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同時採用定群追蹤研究與中介分析方法，以探討在民眾的貪腐感知變化轉化為公民參與行動的過程中，政治效能感是否扮演著關鍵的機制。本研究的分析結果顯示，貪腐感知對選舉和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均具有負面影響。當個人貪腐感知隨著時間增加，其公民參與行為的強度將進一步減弱。在影響機制方面，對於投票參與而言，政治效能感並非解釋貪腐感知影響的關鍵因素；然而，對於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行為而言，政治效能感則成為解釋貪腐感知影響機制的重要因素。因此，貪腐感知對兩種公民參與形式的影響存在著機制上的差異。本文期望透過上述分析，使貪腐因素能夠在我國公民參與相關研究中獲得更多的重視，對我國廉政治理和促進公民參與方面的理論和政策提供不同角度的見解和反思。

關鍵詞：公共治理、廉政形象、公民參與、中介分析、定群追蹤研究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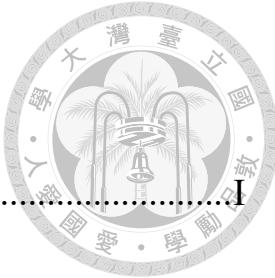
In modern democratic countries, anti-corruption conducts and promotion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are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public governance, in which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has put significant efforts, including amending anti-corruption regulations, expanding avenues for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empowering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is commitment to integrity and political rights has also been recognized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recent year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citizen participation has increasingly emphasized the role of corruption, and empirical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orrup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 influences citizen participation. However, there is relatively littl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corruption on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particularly using panel data analysis.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utilize the panel data provided by the Taiwan Institute for Governance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IGCR) from 2018 to 2020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corruption on citizen participation among the Taiwanese public.

This research posits that political efficacy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explaining how perceived corruption affects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us, the study employs both panel data analysis and mediation analysis method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political efficacy acts as a critical mechanism in transferring individuals' perceptions of corruption into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perceived corruption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both electoral and non-electoral participation. As individual perceptions of corruption increase over time, the intensity of their citizen participation decreases. Concerning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efficacy does not emerge as a key factor in explaining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corruption perceptions. Yet, in the context 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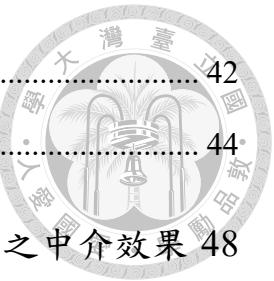
non-elector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efficacy serves an important role as a mediating factor. As a result,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corruption on these two form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shows differences in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rough the aforementioned analysis, this study aims to draw greater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corruption in citizen participation research in Taiwan, also offering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and reflections on anti-corruption governance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policies and theories.

Keywords: Public Governance, Corruption Perceptions, Citizen Participation, Mediation Analysis, Panel Study

目錄



誌謝	I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11
第三節 章節架構安排	12
第二章 貪腐感知對民主治理的威脅：公民參與的視角	13
第一節 貪腐感知定義及其對於公民參與的重要性	13
第二節 公民參與定義與參與動機	18
第三節 貪腐感知如何影響公民參與：政治效能感的中介效果	22
第四節 人口特徵變數對公民參與的影響	29
第三章 資料介紹、分析方法與模型設計	31
第一節 研究資料介紹	31
第二節 定群追蹤資料的分析優勢與常見方法	35
第三節 兼顧組內與組間效應：固定與隨機效果並用法之運用	36
第四節 探索影響機制：中介效應分析之概念與方法	38
第五節 貪腐感知影響公民參與之模型設定	40
第四章 公民參與、貪腐感知與政治效能感之測量及變化趨勢	42



第一節 投票參與及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的測量與年度變化.....	42
第二節 貪腐感知及政治效能感的測量與年度變化.....	44
第五章 貪腐感知對公民參與的影響：兼論政治效能感之中介效果	48
第一節 貪腐感知對投票參與的影響.....	49
第二節 貪腐感知對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的影響.....	53
第三節 貪腐感知對兩種公民參與行為的影響機制差異	56
第四節 不同貪腐感知變化群的人口特徵分析	59
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研究建議.....	63
第一節 理論與實務意涵	63
第二節 研究貢獻	66
第三節 研究檢討與未來展望	69
參考文獻	72
附 錄 TIGCR-PPS 2018-2020 問卷內容及分析編碼	87

圖 目 錄



圖 1-1 1996-2020 年我國總統大選投票率變化趨勢（單位：%）.....	3
圖 1-2 2000-2021 年我國集會遊行預估參加人數變化趨勢（單位：萬人）.....	3
圖 2-1 2012-2021 年我國 CPI 指數變化趨勢	6
圖 3-1 2017-2021 民眾對政府整體廉政工作滿意度（單位：%）	8
圖 4-1 貪腐感知影響公民參與架構圖	41
圖 5-1 2018 年九合一大選及 2020 年總統選舉投票率（單位：%）	42
圖 5-2 2018 年至 2020 年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平均次數變化趨勢（單位：次數）	43

表目錄



表 1-1 2017-2021 民眾對政府清廉程度的評價（單位：%）	7
表 2-1 TIGCR-PPS 2018-2020 三年度定群追蹤樣本完成數一覽表.....	33
表 3-1 TIGCR-PPS 2018-2020 年定群追蹤樣本人口特徵分布 (N = 1228).....	34
表 4-1 變數測量與描述性統計.....	47
表 5-1 投票參與的固定與隨機效果並用法之中介效應分析結果.....	50
表 5-2 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的固定與隨機效果並用法之中介效應分析結果.....	54
表 6-1 性別與貪腐感知變化趨勢卡方檢定.....	59
表 6-2 年齡與貪腐感知變化趨勢卡方檢定.....	60
表 6-3 教育程度與貪腐感知變化趨勢卡方檢定.....	61
表 6-4 政黨傾向與貪腐感知變化趨勢卡方檢定.....	62



第一章 緒論

我國民主化已逾 30 多年，在貪腐治理與公民參與方面的改革也已經頗有建樹。但時至今日，黑金腐敗仍是對我國民主政治的重大威脅，且民眾也對貪腐深有所感，近年我國的公民參與情況似乎也出現下滑的跡象。有鑑於此，本研究企圖探討民眾的貪腐的感知如何影響其公民參與行為，並透過政治效能感等重要的政治態度變數，深入理解該影響的背後運作機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現代民主國家中，促進公民參與為民主治理的重要面向。透過基層的公民參與，政府得以改善公共政策品質、協調各方利害關係者、以培力賦權的方式深化民主，並讓公民對政治菁英們進行課責 (Skelcher & Torfing, 2010)，以彌補代議政治下公民與官僚及代議士之間的隔閡，落實回應性、代表性和課責性等重要民主治理價值。

從政府治理品質的觀點上來看，政府是否受法律約束，和具有專業性、行政效能和效率的官僚體制，以及廉潔低腐敗的政治環境，為政治學研究中判斷政府治理品質的重要面向。當探討民主制度對於治理品質的影響時，貪腐則是相關研究所關注的焦點，許多研究均指出民主體制可以透過降低貪腐的方式對改善政府治理品質，即使控制經濟因素與官僚體制後也依然成立。當公民願意花費精力投入公民參與，能起到對政府進行課責並控制貪腐發生的作用，並促使政府回應民眾的需求。隨著國內民主制度逐漸鞏固，民主制度抑制貪腐的作用也會越發明顯 (Bohara et al., 2004; Blake & Martin, 2006; Bäck & Hadenius, 2008; Montinola & Jackman, 2002；郭銘峰等人，2023)。



我國自民主化以來已經經過了三次和平政黨輪替，已達成 Huntington (1991) 所提出的雙翻轉測驗 (two-turnover test) 的民主鞏固標準。在民主體制的運作方面，我國在外部機構的民主政治評比上也取得相當良好的成績，2018 至 2022 年我國在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所評比的「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的各年度總分在亞洲皆僅次於日本，公民自由的分數則與日本相同，這在全球民主退潮的趨勢下顯得更加難得可貴 (Freedom House, 2022)。

在促進公民參與方面，我國各級政府也推動了許多相關政策與措施，例如建置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鼓勵民眾勇於對公共議題發表意見，並透過提案和附議等制度促使政府回應民眾需求；地方政府舉辦參與式預算，使民眾參與政府預算資源分配的過程；在蒐集與凝聚民意上，除了針對特定政策舉辦正式公聽會之外，也通過舉辦公民參與工作坊，讓政府、企業和民眾等利害關係人之間能夠針對政策或公共事務進行討論，經由讓參與者在政策問題進行交流，可以有效提升政策品質，並消除利害關係人的疑問和不信任，達到改善政策品質和政策合法性的目標。除此之外，藉由推行上述政策也能夠增進民眾對公共議題的興趣和認知，提升民眾在公民參與方面的能力，達到賦權培力的效果。

儘管我國政府在促進公民參與方面做了相當多的努力，且在民主運作的評比上取得亮眼的表現，但相關數據顯示公民參與制度的進步，不一定能反映在公民參與的實際變化上。換言之，單純的賦權培力不一定能帶來公民參與持續穩定的進步。以下圖 1-1 與圖 1-2 分別為我國近 20 年來的總統大選投票率與集會遊行參與人數的變化趨勢，顯示我國民眾在公民參與強度上的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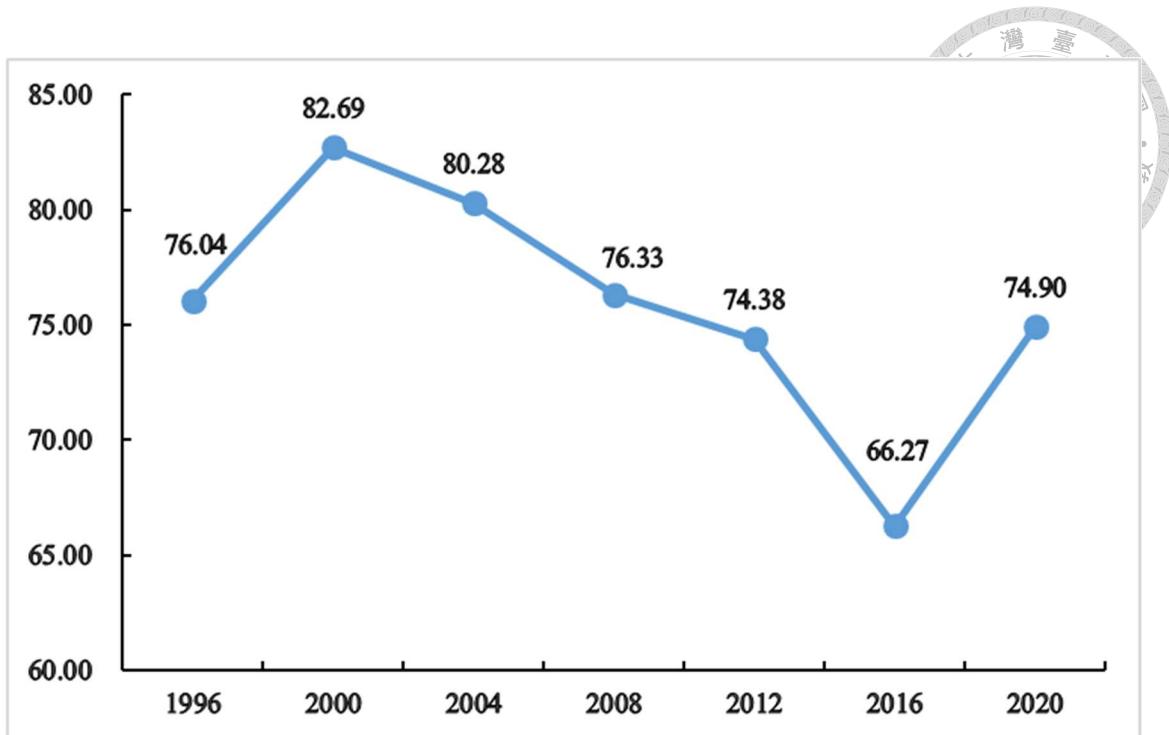


圖 1-1 1996-2020 年我國總統大選投票率變化趨勢（單位：%）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參考自中選會歷屆公職選舉資料（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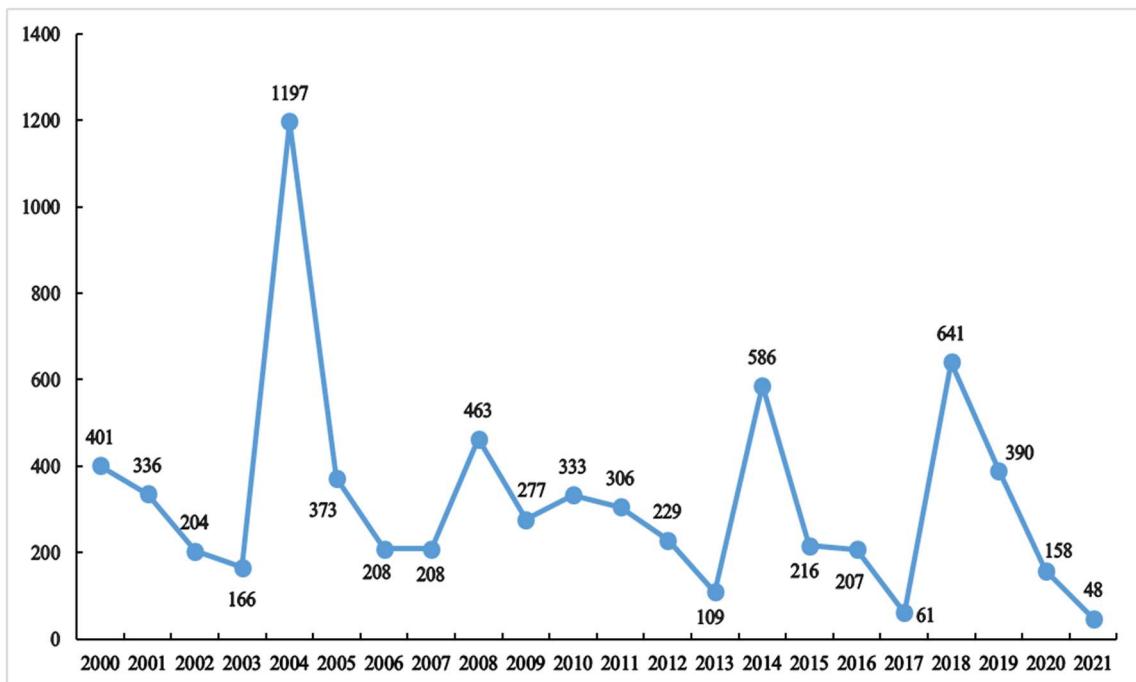


圖 1-2 2000-2021 年我國集會遊行預估參加人數變化趨勢（單位：萬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參考自警政統計查詢網。



自 2000 年總統大選開始，我國的總統大選投票率便不斷下滑，在 2016 年的下滑趨勢尤其明顯，直到 2020 年才回升至與 2012 年相近的投票率水準。在集會遊行預估參與人數方面，會發現儘管受到首次公投與地方九合一選舉合併舉行的刺激，2018 年的參與人數達到僅次於 2004 年的高峰，但參與人數跌破百萬人的低點卻出現在 2017（61 萬人）年與 2021 年（48 萬人），儘管 2021 年的歷年最低點可能與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有關，但在疫情爆發前的 2017 年參與人數就已經出現衰退的徵兆。綜上所述，目前我國在常規性政治參與 (conven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的選舉投票，以及非常規性政治參與 (unconven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的集會遊行上，都很有可能已經出現衰退的趨勢。正如本文前揭所述，民主體制對於治理品質的正面影響，其關鍵機制在於民眾是否願意參與公共事務，對政府進行課責並使其回應民眾訴求。因此，分析我國公民參與變化趨勢背後的重要影響因素，具有其重要性與緊迫性。

民主政體的治理優勢，在於民眾投入公民參與所產生的正面影響，但民主體制是否良好運作，也會影響公民選擇表達自身訴求的方式，如果公民認為民主體制運作不良，使其無法依循政府體制內的管道表達意見，則可能採取更激勵的抗爭手段，抑或是不再投身公民參與 (Carothers & Young, 2015)。從全球趨勢來看，不論是成熟民主國家，抑或是在第三波民主化下出現的新興民主國家，民眾對於民主治理的不滿都出現增加的趨勢。Foa 與 Mounk (2019) 探討 154 個國家的民眾從 1995 年至 2018 年對於民主制度的看法，發現對於民主制度不滿意者的數量占比從 47% 增加到 58%，若以 2005 年作為起點，則是從 38% 增加至 58%。此外，相較於新興民主國家，具有成熟民主體制運作的已開發國家，其民眾對於民主體制不滿情緒上升趨勢更加明顯。

公民之所以對於民主制度產生不滿，主要可分為兩大面向的因素：第一個面向為民主化過程 (democratic processes) 本身被侵蝕，例如民選首長透過修改與解釋



法律等方式，以達到鞏固自身權利和攻擊對手的目的 (Bermeo, 2016)；第二個面向為民主體制運作不良，民主體制運作不良又可再分為「政府績效」(government performance) 和「貪腐」(corruption) 兩大面向，前者代表政府在運作上無效能與無效率，沒有能力有效解決公共問題與民眾需求，後者則會嚴重損害政府的回應性及公信力，因為民眾無法相信腐敗的政府能夠公平地回應民眾的需求。實證研究也指出，貪腐對於民主滿意度的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且會降低民眾對於政治制度和公務員的信任 (Anderson & Tverdova, 2003; Donovan & Karp, 2017; Weitz-Shapiro, 2008)。綜上所述，貪腐除了會導致社會資源無法得到公平配置外，也會損害民眾對於政府施政品質及回應性的信心，造成公共治理危機 (Caiden, 2001)。因此，探討哪些威脅民主政治運作的因素，會影響我國公民參與的情況時，除了政治極化（蕭怡靖，2019）與地方派系（趙永茂，2018）之外，貪腐也是值得探討的重要因素。

有鑑於貪腐對於社會資源配置和民主體制的破壞，我國政府在反貪腐方面做出了許多努力，包括在 2015 年通過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UNCAC) 施行法，並於 2016 年開始陸續修正如刑法、洗錢防制法和政府採購法等相關法律規範，以符合 UNCAC 的標準並健全反貪腐法制架構，且於 2018 與 2022 年完成了兩次國際專家審查（廉政署，2022a）。在改善法規之外，政府也透過多種方式抑制貪腐，例如廉政署在 2016 年推動各機關針對巨額採購案設立廉政平臺，加強採購案件流程的外部監督及資訊透明，此外也透過設立透明晶質獎等激勵措施，鼓勵公部門改善廉能表現。從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公布的清廉印象指數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 來看，我國的 CPI 不論是分數還是全球排行都在持續進步，更在 2021 年達到歷史高峰，顯見政府的廉政改革已經取得一定成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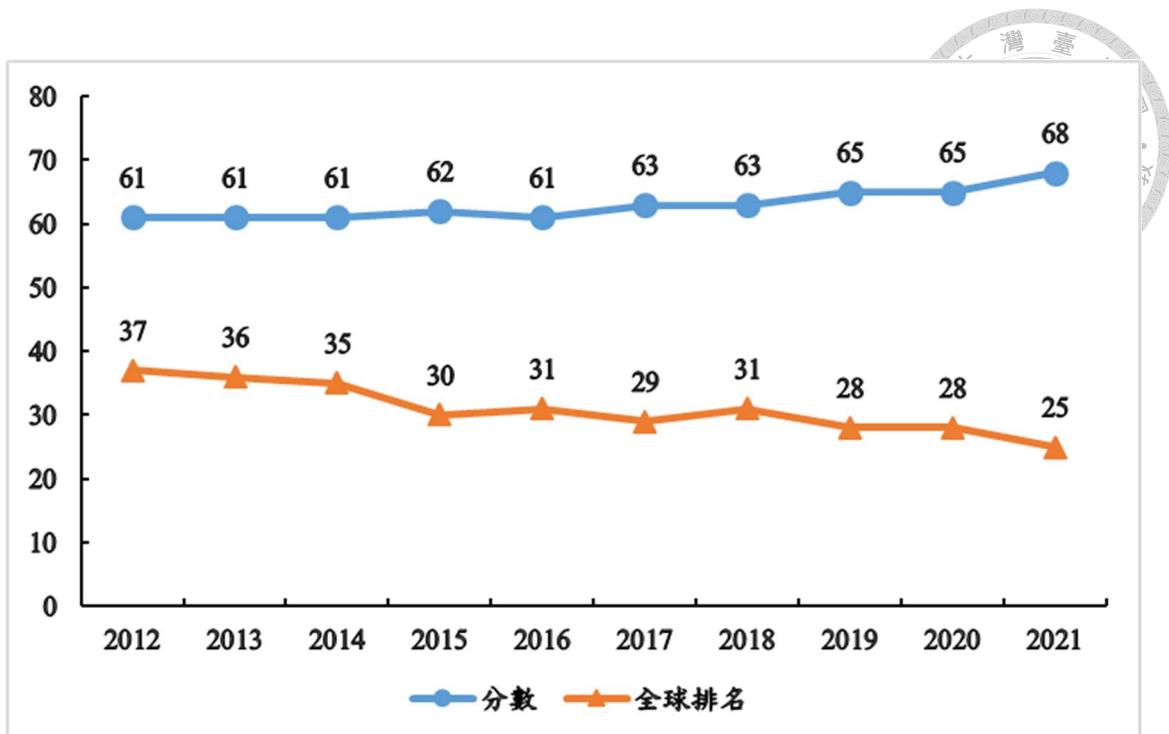


圖 2-1 2012-2021 年我國 CPI 指數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參考自國際透明組織（2021）。

但是，我國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的貪腐事件，自民主化以來始終都無法完全根絕。例如涉及前總統陳水扁家庭與執政團隊的收受賄賂、內線交易與詐領國務機要費案（林孟潔、王宏舜、王聖藜，2022），以及涉及前總統馬英九執政團隊與同黨地方首長陸續爆發收受賄賂案件等等（呂欣芷，2021）。近年也陸續爆發涉及各層級行政及立法機關的貪瀆案件，例如 2017 年有媒體報導屏東縣三分之一的鄉鎮市長涉嫌貪汙賄選（王己由，2017）；2018 年前花蓮縣長傅崐萁因股票案被判處有期徒刑（溫嘉楷，2018）；2020 年檢調起訴涉及集體貪瀆案件的廖國棟、陳超明、徐永明、蘇震清、趙正宇等五位立法委員（林長順，2022）；2021 屏東市長林協松因貪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022 年宜蘭縣長林姿妙因涉嫌貪汙遭檢調聲請羈押等等（沈如峰，2022）。而根據廉政署（2022b）公布的貪瀆案件起訴人次資料，我國民意代表在 2021 年遭起訴的人次達到自 2009 年以來的最高點。



CPI 指數是以專家學者的角度，評估一國公部門的貪腐情況與廉政制度的完善程度，對於廉政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但在貪腐事件仍持續發生的情形下，政府在廉政上所做出的努力，是否反映在民眾的認知上，則是 CPI 分數無法揭示的資訊。臺灣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hinese Taipei, TICT) 受廉政署委託執行「廉政民意調查」，由陳俊明等人(2021)執行針對全臺民眾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民眾對於政府清廉程度及廉政工作的表現，皆是負面評價高於正面評價，可見專家評估與民眾感知存在一定落差。表 1-1 與圖 3-1 分別為 2017 年至 2021 年廉政民意調查中我國民眾對於政府清廉度與廉政工作的評價，整體數據顯示各年度民眾對中央政府清廉度抱持負面評價的人數占比均在三成以上，對於廉政工作的不滿意人數則占約四成，但在中央政府之外，民眾對於縣市政府和鄉鎮市區公所的清廉程度正面評價則逐年上升，顯示廉政改革的成效。

表 1-1 2017-2021 民眾對政府清廉程度的評價（單位：%）

政府層級	年度	非常清廉	還算清廉	有點不清廉	非常不清廉	無反應
中央政府	2017	1.8	35.8	20.8	11.6	30.0
	2018	1.6	27.7	20.2	16.9	33.5
	2019	5.6	29.3	17.5	18.3	29.3
	2020	5.8	36.6	16.8	14.1	26.8
縣市政府	2017	4.3	42.5	18.6	5.7	28.9
	2018	3.5	39.7	16.2	6.3	34.3
	2019	7.1	43.1	9.5	3.5	36.9
	2020	7.1	44.9	11.4	4.0	32.6
鄉鎮市區公所	2017	3.5	38.2	15.7	3.5	39.1
	2018	5.9	38.2	8.7	3.4	43.7
	2019	6.9	43.1	6.1	1.8	42.1
	2020	6.4	47.1	7.6	1.3	37.6
整體政府	2021	5.7	29.6	21.5	20.9	22.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陳俊明等人 (2017-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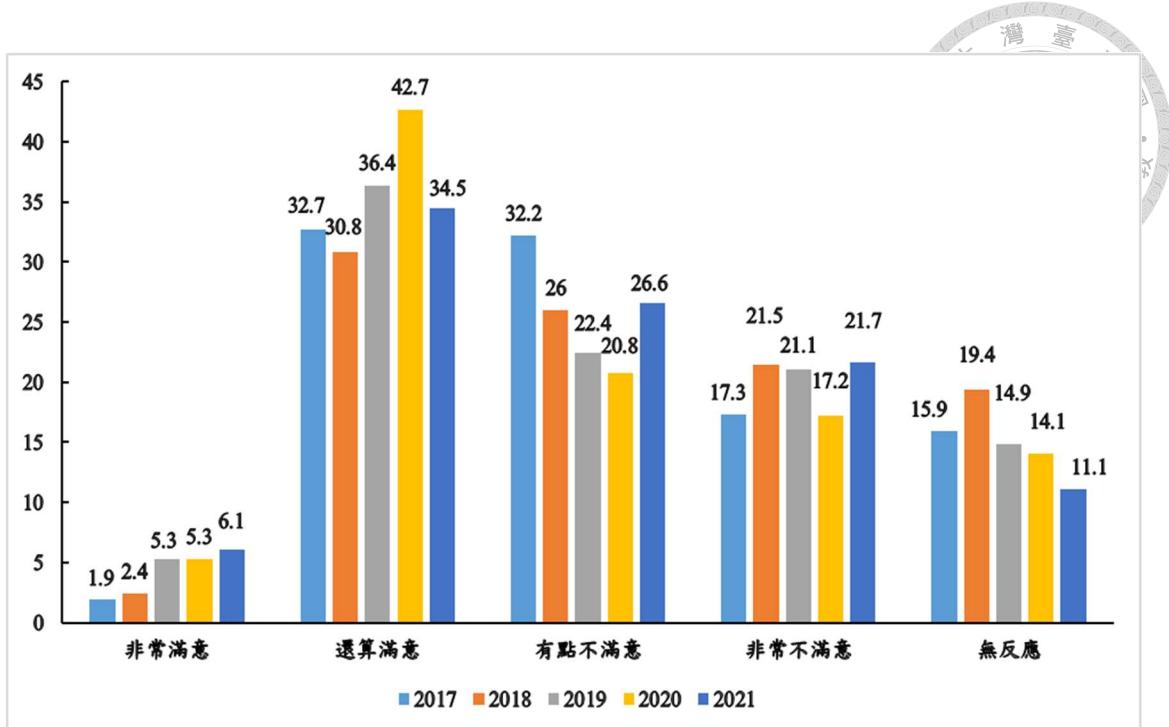


圖 3-1 2017-2021 民眾對政府整體廉政工作滿意度（單位：%）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參考自陳俊明等人（2017-2021）。

對於民主治理而言，貪腐是判斷治理品質良莠的重要因素。此外，民主的制度優勢也需要仰賴民眾投入公民參與對政府進行課責，以達到抑制貪腐和維持政府回應性的目標，因此探討影響公民參與的重要因素，對於民主治理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目前已經有許多研究探討哪些因素會影響民眾的公民參與行為，涵蓋宏觀層次的政治文化、社經環境、司法獨立和政黨體系，再到個人層次的公民規範、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政治興趣和社經地位等因素。如本文前揭所述，民主體制運作是否良善，會深刻影響民眾公民參與行為，但貪腐作為其中的重要面向，卻相對鮮有公民參與研究文獻分析其影響。

我國公民參與相關研究較少關注民眾的貪腐感知的影響，目前我國與貪腐相關的公民參與實證研究，大多聚焦在 2006 年發生的倒扁紅衫軍運動，例如蔡佳泓（2008）分析我國不同區域民眾對紅衫軍運動的支持度差異，劉嘉薇（2014）指出政黨傾向和政治資訊來源是影響民眾是否參與紅衫軍運動的重要因素等等。儘管

林向愷（2008）等學者從更宏觀的角度，指出缺乏民眾監督的政府容易出現貪腐，而在政府缺乏改革動力且貪腐情況不改善下，會使民眾感到失望並疏離政治場域，使民主發展陷入倒退的惡性循環，但相關實證成果仍相當有限。



目前國際上有學者指出腐敗是在選舉及公民參與研究中相對少見，且逐漸被重視的因素 (Bazurli & Portos, 2019; Stockemer, 2016)，例如 Bernburg (2015) 分析 2009 年冰島因金融危機發生的「廚具革命」(Pots and Pans Revolution)，發現民眾對於政府的貪腐情況的廣泛認知，是影響其是否參與行動的重要因素，公部門的貪腐會激起民眾的不滿和憤怒，使其決定採取集體行動，以尋求清廉、課責和更好的治理品質。當政府體系被民眾廣泛認為是不誠信且是被既得利益者所操弄的，民眾就不會相信體制內的改革機制，因此會更偏好非選舉形式的公民參與來表達他們的不滿並尋求改革。

除了客觀的貪腐指標外，目前已經有實證文獻指出貪腐資訊對於公民參與的影響 (Bauhr & Grimes, 2014; Bazurli & Portos, 2019; Sousa & Bezerra, 2013; Sundström & Stockemer, 2015)。透過對貪腐感知進行分析，研究發現貪腐感知除了可能促使民眾投入公民參與之外，也可能存在相反的「反動員」(demobilization) 影響，Bauhr 與 Grimes (2014) 指出隨著政府在資訊透明度的提高，民眾接收到更多的腐敗資訊，會使民眾在公民參與上更加消極，Sousa 與 Bezerra (2013) 的研究也提出相似的結論，指出若民眾感知到貪腐是廣泛存在且難以改變的，則民眾不會選擇以公民參與的方式對政府進行課責。綜上所述，貪腐對於公民參與的影響相當複雜，而民眾的貪腐認知是其中重要的影響因素，若民眾認為貪腐在政府中是廣泛存在且難以改變的，則會選擇離開公民參與場域，而非選擇投入公民參與影響政府。當民眾因為感知到貪腐情況無法改變而不願意投入公民參與，將導致政府的貪腐因缺乏課責而進一步加深，而貪腐又將對民眾的公民參與意願產生負面影響，使民主治理陷入難以擺脫的惡性循環。



本文旨在通過實證研究了解貪腐感知對於公民參與的影響，除了分析貪腐感知是否對於公民參與有顯著影響以外，產生影響的機制也是本文關注的焦點。如本文前揭所述，貪腐感知之所以能夠影響公民參與行為，其關鍵在於貪腐感知會損害民眾對於政府回應性的信心，當民眾覺得無法透過常規性的參與方式影響政府時，就會試圖採取更激烈的參與方式，而當民眾認為貪腐情況嚴重且難以改變時，民眾則會選擇不投入公民參與。民眾對政府回應性的認知對應到政治態度上的概念，就是「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政治效能感越高的民眾，越相信能夠透過自己的力量影響政府決策，也越可能積極從事公民參與。

相關實證文獻在詮釋貪腐對於公民參與的影響時，多以政治效能感作為依據，例如 Sundström 與 Stockemer (2015) 開述貪腐感知對於民眾投票率的負面影響時，認為其負面影響是源於選民認為履行投票義務的價值下降；Bazurli 與 Portos (2019) 則指出貪腐資訊容易讓反菁英主義在對政治較不熟悉的群眾中發酵，使其更容易從事體制外的公民參與行為，尤其在低政治信任且高政治效能感的民眾中更能夠看到此類現象。但是，鮮少有文獻的分析聚焦在政治效能感是否為貪腐感知影響公民參與的機制，Kostadinova (2009) 與 Olsson (2014) 為少數以量化實證方法驗證此機制的學者，其研究結果證實貪腐感知確實會減損民眾的政治效能感，進而對公民參與造成負面影響。

綜上所述，從政府公開資料來看，目前我國的公民參與程度呈現下滑的趨勢，且民眾對政府廉政表現的負面評價也與國際評鑑指標的良好表現存在落差。文獻顯示貪腐感知可能對公民參與產生負面影響，因為當民眾對政府的廉政表現感到懷疑時，他們可能會失去對政府回應性的信心，感到無力改變現狀而脫離公民參與的場域，對民主體制的運作造成損害。但是，我國近年相關實證文獻卻鮮少探討貪腐感知與公民參與行為之間的關聯，因此貪腐感知對我國公民參與的影響值得特別關注。



研究貪腐感知對公民參與的影響不僅在民主治理層面上具有重要性，同時能夠進一步豐富和完善我國相關實證研究的成果，深化對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理解，為政府制定相應政策和措施提供依據，並進而提升公民對於政府的監督能力，促進公民與政府之間的互動和溝通。除此之外，從研究區域上來看，目前有關貪腐影響公民參與的研究，仍相對集中於貪腐情形較嚴重的開發中國家，例如南亞、中南美洲與非洲諸國 (Biswas & Vijaya, 2018; Carreras & Vera, 2018; Machado et al., 2011; Monyake, 2019)，對於已開發國家的關注則相對較少，因此以我國做為研究對象能夠進一步鞏固既有的實證成果。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文研究目的旨在探討貪腐感知對於公民參與的影響，以及驗證政治效能感是否為影響的重要機制，研究資料使用臺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 (Taiwan Institute for Governance and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TIGCR) 提供的民眾定群面訪追蹤調查 (Political Polarization Survey, TIGCR-PPS) 進行分析，研究對象為我國 2018 至 2020 年 20 歲以上國民。

本研究採用公民參與行為作為依變數，貪腐感知作為自變數的研究模型框架。考量到理論上政治效能感為貪腐感知影響公民參與的重要機制 (Kostadinova, 2009; Olsson, 2014) 之後，以及許多實證研究支持政治效能感與公民參與之間存在密切關聯（俞振華、翁定暉，2017；Hooghe & Marien, 2013; Oh & Lim, 2017; Zhu, Chan & Chou, 2021），因此本研究將政治效能感作為貪腐感知影響公民參與的重要機制納入研究框架，以探討其在貪腐感知對公民參與影響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文的核心研究問題主要有以下三點：

其一，公民的貪腐感知對其公民參與行為具有何種影響？是促使民眾更熱衷於公民參與，抑或是使民眾脫離公民參與場域？

其二，公民的貪腐感知對公民參與的影響，政治效能感是否為重要的影響機制？貪腐感知之所以能夠影響公民參與，是否源於貪腐感知影響民眾對政府回應性認知，並進而影響其參與行為。

其三，貪腐感知對於投票參與和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兩種不同公民參與的影響，政治效能感是否皆為重要的解釋機制？¹

第三節 章節架構安排

本文章節安排如下：第二章將回顧目前在貪腐感知影響公民參與方面的實證研究成果，並且說明政治效能感作為影響機制的重要性；第三章將介紹本文所使用的分析資料，以及統計分析方法和理論框架模型；第四章將說明研究變數的操作定義，並對研究資料中的關鍵變數進行初探；第五章為本文主要的實證分析結果，揭示我國民眾的貪腐感知對其公民參與行為的影響，並驗證其中政治效能感是否為重要的機制；第六章則總結本文對於相關理論和實務的意涵及貢獻性，並討論本文的研究限制和未來可行的精進方向。

¹ 本文所關注的公民參與行為包含代議民主下的投票參與，以及其他對於民主治理至關重要的廣泛公民參與行為，為公民因公共議題而嘗試以自身力量影響政府的參與行為，例如連署、參與公聽會、政治消費、集會遊行等諸多面向的參與行為，文獻上通常將其形容為投票之外的公民參與 (beyond voting)，其涵蓋範圍難以用傳統政治參與分類進行概括。本文幾經斟酌，參考 Bazurli 與 Portos (2019) 對於公民參與的歸類方式，將本文所指涉的公民參與行為劃分為「投票參與」(voting) 和「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non-electoral participation)。



第二章 貪腐感知對民主治理的威脅：公民參與的視角

目前國際上已經陸續有文獻指出貪腐因素對於公民參與的強度與形式存在影響，但我國公民參與相關研究鮮少考慮貪腐因素的影響，遑論深入探討影響的運作機制。因此，本章旨在整理目前與貪腐感知有關的公民參與相關研究，並闡述政治效能感作為影響機制在本研究中的重要性。

第一節 貪腐感知定義及其對於公民參與的重要性

一、貪腐感知定義

在討論貪腐感知之前，首先要先釐清本文所指涉的貪腐定義範圍。儘管貪腐現象並不只存在於公部門中 (Pope, 2000)，但由於本研究旨在研究我國公民的貪腐感知對其公民參與的影響，因此所指涉的「貪腐」將限縮於與公部門相關的貪腐。在貪腐的定義方面，Tanzi (1998: 564) 以及 Pope 與 Vogl (2000: 6) 提出貪腐意為政府官員或公務員濫用其公權力以謀取私利，而由於新公共管理 (new public management) 等行政改革浪潮的興起，政府與民間部門的合作與委託關係日漸增加，因此國際透明組織 (TI) 將貪腐重新定義為「濫用受委託的權力以謀取私利」 (Pope, 2000: 1; 余致力等人, 2018: 41)。貪腐行為包含的種類相當繁多，從政治人物透過制定特定政策謀取私利，到公務員收受賄賂，甚至是將公務車作為私人用途等不當行為，都可能被歸類為貪腐行為。

從貪腐發生的層級來看，Amundsen (2019) 認為貪腐可以按照發生的層級分為政治貪腐 (political corruption) 與行政貪腐 (bureaucratic corruption)。前者指得是政治決策者使用自身政治權利來維持權力或謀取私人的利益，例如有系統性地違反法規及制定對自身有利的規範，威權國家政府更容易出現制度性的政治貪腐現象，也被稱作權貴貪腐 (grand corruption)；後者則是指政策執行端與公共服務提供端的



行政面貪腐，也被稱為輕度貪腐 (petty corruption)。除了按照貪腐發生的層次進行分類以外，Amundsen (2019) 也將貪腐發生規模將貪腐分為個人貪腐 (individual corruption) 及集體貪腐 (aggregated corruption)，或是根據貪腐行為的發起者與資源的流動方向分為重分配性貪腐 (redistributive corruption) 或榨取性貪腐 (extractive corruption)。儘管行政貪腐也被稱輕度貪腐，但行政貪腐也可能會對社會造成廣泛的傷害，且政治貪腐與行政貪腐之間具有相當緊密的關係，政治面的法規與政策制定決定了行政貪腐是否有生存的土壤，而行政貪腐很有可能也是構成政治貪腐的重要一環，例如基層公務員可能是高階官員謀取不當利益的工具，成為結構性貪腐中的一員。反之，若政治貪腐因為廉潔的政治環境和有效的反貪作為而無法形成規模，那麼行政貪腐通常也只會是偶然出現的個人行為。

從上述對於貪腐的定義出發，可以從四個面向了解貪腐感知的類型：第一個面向為貪腐感知究竟是來自民眾對於社會與國家的整體認知，還是來自其個人的實際經驗；第二個面向為感知的範圍，也就是貪腐感知來自於民眾與基層公職人員互動下的結果，還是對於整體政府或高層官員的評價；第三個面向為貪腐感知源頭的差異，可分為動機型 (motivational) 與評價型 (evaluative)，前者來源於公民因為所處的既有環境而參與在貪腐的情境之中，後者則是對於整體政府機構的運作評價；第四個面向則是貪腐感知的靜態與動態之分，靜態代表著公民的既有的實際貪腐經驗，而動態則代表公民對於貪腐情形變化趨勢的擔憂 (Kostadinova & Kmetty, 2019)。從概念上可以看出，以上四種分析面向分別可以對應到政治貪腐與行政貪腐兩種貪腐形式：由於一般民眾日常生活很少能夠實際接觸到政治菁英，因此政治貪腐與民眾認知的距離較遠，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的是民眾對於國家與社會的整體感知，而行政貪腐更接近民眾日常生活中與政府互動的環節，因此與民眾實際生活經驗的關係更密切。



貪腐感知除了會受到個人的政治態度、政黨傾向、媒體接觸與基本屬性等因素影響之外，民眾對於行政機關的貪腐感知主要受到行政效率、行政透明、行政裁量與行政績效等四個面向所影響：行政效率指得是若行政機關效率不彰，民眾很可能會懷疑效率不彰是因為自己沒有給予承辦人員好處；行政透明則是行政機關資訊與行政流程需要公開透明，才能使民眾得以進行更有效的監督，例如公開政府採購資訊；行政裁量則是公務員在依法行政的過程中，往往需要對法律進行解釋，而在該過程中的裁量權大小也是貪腐可能滋生之處；施政績效則強調除了回應性與代表性等傳統公共行政績效之外，廉潔性也會深刻影響民眾對公部門的評價（黃東益等人，2011）。此外，民眾對於貪腐的感知與容忍度存在一定模糊空間，並非所有貪腐行為都會被視為貪腐行為：Heidenheimer(1970; 2004) 將貪腐行為依照情節從重至輕分為黑色貪腐 (black corruption)、灰色貪腐 (grey corruption) 與白色貪腐 (white corruption)，除了明確違法且情節嚴重的黑色貪腐之外，灰色貪腐與白色貪腐可能不會被一部分人認為是貪腐行為，抑或是該貪腐行為應該被懲罰。黑色貪腐指得是從政治菁英到一般民眾都無法容忍的貪腐行為，例如公務員收受紅包；灰色貪腐指得是一部分人開始能夠容忍此種貪腐現象，例如順道私用公務車輛；白色貪腐則代表大部分人都能夠容忍此種行為，例如公務人員在公差任務完成後的剩餘時間於當地旅遊。

二、貪腐感知影響公民參與的重要性

在民主治理下，促進公民參與的重要目標為抑制貪腐，並且理想上預期公民會由於感知到政府中存在貪腐現象，進而採取更積極地進行公民參與方式影響政府，並對政府進行課責。目前國外實證文獻已經開始逐漸重視貪腐對於公民參與的影響，並認知到儘管理想上貪腐感知可以使民眾透過公民參與等方式對貪腐的個人或組織進行課責，但也可能使民眾喪失對於民主制度的信心，退出對於貪腐進行垂

直課責的行動，導致民主制度的穩定性受到破壞 (Canache & Allison, 2005)。但從整體來看，目前不論是國內及國外實證研究文獻，將貪腐感知作為影響政治參與的重要因素的文獻都相對較少 (Bazurli & Portos, 2019; Stockemer, 2016)。



我國目前對於貪腐的研究，集中於貪腐定義與測量 (余致力等人, 2018)、貪腐現象成因 (余一鳴, 2012；林宗弘、韓佳, 2008；Zhang, et al., 2019)、貪腐現象的空間分析 (廖興中、呂佩安, 2013；廖興中、徐明莉, 2017；廖興中, 2014, 2018)、民眾貪腐容忍度或對政府清廉評價 (莊文忠、余致力, 2017；莊文忠等人, 2017；陶宏麟、邱于恆, 2019；蘇毓昌、胡龍騰, 2013)，以及廉能治理 (余致力, 2006；林向愷, 2008；周思廷等人, 2021；陳敦源、蔡秀涓, 2006) 等領域。在民主治理上，我國已經有不少文獻注意到公民參與對於廉能治理的重要性，例如余致力 (2006) 強調民主政治下政府與民眾之間的委託代理人關係，並說明代議政治下民眾仍需積極參與政治，以維持對於政府廉潔性的監督和控制；林向愷 (2008) 指出貪腐會扭曲社會資源的配置，而民主體制可以降低大規模系統性貪腐出現的機會，且這個過程需要仰賴公民積極地進行公民參與。然而，儘管已經有許多文獻指出公民參與對於廉政的重要性，卻鮮少有文獻關注人民對政府廉潔性的認知是否會影響其公民參與行為。

探討貪腐感知影響公民參與的重要性，在於了解民主治理下的良性循環能否產生，此處的良性循環指得是當民眾貪腐感知升高，會採取公民參與行動以改變現狀，政府的廉潔性和治理品質因公民參與而提高，進一步使民眾更願意進行公民參與行為。Bauhr 與 Grimes (2014) 指出在理想的情況下，透過提高政府資訊的透明度，可以更好地揭露政府的腐敗資訊，當民眾接收到腐敗資訊後，會要求政府針對腐敗的不當行為進行調查，或是透過公民參與的方式對政府進行課責，受到課責的政府對此作出回應並提高治理品質，從而形成良性循環。Bauhr 與 Grimes 透過分析 2005 至 2007 年世界價值觀調查 (World Values Survey, WVS) 中的各國數據卻發



現，此種良性循環能夠成立，取決於兩個條件：第一，民眾會因為接收到貪腐資訊而以公民參與的方式對政府課責，而不會因為貪腐感知升高導致其離開公民參與的場域；第二，如果民眾缺乏有效的公民參與管道以改變現狀，或是公民參與的影響成效不彰，民眾就可能不會選擇投入公民參與，因此政府透明度提高需要搭配良好有效的公民參與管道，才能建立起公民參與的良性循環，對於貪腐情況嚴重且缺乏有效參與管道的國家，提高透明度（讓人民接收到更多貪腐資訊）反而會對公民參與產生負面影響。綜上所述，良性循環能夠成立的第一個條件關鍵在於貪腐感知對於公民參與的影響，第二個條件則與客觀環境上貪腐的嚴重程度和公民參與管道是否暢通密切相關。正如本文第一章所述，我國政府在廉政和公民參與政策上都已經做了相當多的努力，國際相關評鑑指標表現也相當出色，因此可以推論客觀環境上已經具備良性循環成立的條件，而在客觀條件之外探討民眾主觀認知如何影響其公民參與行為，其對於民主治理研究就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

從實證研究上來看，除了對整體政府的貪腐感知以外，公民對於官僚的貪腐感知也可能對公民參與產生重要影響。根據黃東益等人（2011）的調查報告，相比於政黨因素與政治構面因素（政治信任、政治權力集中程度感知），我國民眾對於行政機關清廉性的感知具有更加廣泛的影響，其對於整體政府、中央及地方政府、總統和地方首長的清廉評價皆有顯著影響，而候選人評價在選舉研究中，與政黨認同和議題偏好都是重要的分析因素（游清鑫、蔡佳泓，2009），鄭夙芬（2014）對於我國 2012 年總統大選的分析也指出，廉潔與能力是民眾最在意的候選人形象面向，Galeotti 與 Zizzo (2018) 則經由實驗法指出法國選民重視候選人的誠信勝過能力。因此，除了民眾對整體政府、政治人物或政黨的貪腐認知以外，民眾對於官僚或行政機關的貪腐認知，對於其投票參與和其他公民參與行為上的影響，也是值得關注的重要問題。本文接下來將闡述目前公民參與的相關研究文獻，並介紹目前與貪腐感知影響公民參與相關的實證研究成果。



第二節 公民參與定義與參與動機

一、公民參與定義

對於民主治理而言，公民參與是其中相當重要的一環。Verba (1996) 指出民主政治能夠順暢運作，是建立在政治菁英能有效回應民眾的需求和偏好之上，而公民則需要透過公民參與讓政府了解自己的需求，進而對政策產出產生影響，形成民主政治運作的反饋循環。此外，公民參與也意味著在解決公共問題上，並非單純由政府提供解決方案，而是讓公民與政府建立合作關係，透過協商不同的利益和觀點，解決政府無法單獨處理的複雜公共問題，以達到維護公共財、解決公共問題和創造公共價值的目標 (Boyte, 2005)。總結而言，公民參與在對政府進行課責、增加公民對於政府決策的影響力、將更多公民納入政府決策過程、培養公民美德與技能，以及增加政府決策的品質和合法性等方面增強治理品質 (Michels, 2011)。在實證研究上，本文於第一章描述了公民能夠透過公民參與對政府進行課責，起到抑制貪腐並增強政府的回應性的效果 (Bovara et al., 2004; Blake & Martin, 2006; Bäck & Hadenius, 2008; Montinola & Jackman, 2002)。

在公民參與的定義上，Putnam (1993) 認為公民可以透過各種方式參與政治或非政治的公共事務和組織，將個人置於一種信任互惠的網絡之中，強調公民參與 (civic engagement) 培養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的目的，因此 Putnam 將傳統政治參與及非政治的參與俱樂部等行為，都視作公民參與的其中一種形式。Adler 與 Goggin (2005) 指出公民參與並無一個統一的定義，其指涉的行為種類包羅萬象，從個人的社交活動與組織性的正式活動，以及社區志願服務到政治參與，都可能屬於公民參與的類型之一。Berger (2009) 則反思了公民參與定義過度模糊廣泛的現象，提出將公民參與劃分為政治參與、社會參與和道德參與三種類型：政治參與包



含大部分與公民身份相關的政治活動，例如投票與參與政黨；社會參與則包含非政治性的社交活動，例如參與志願團體和俱樂部；道德參與則是在特定道德準則下產生的行為，例如匿名慈善捐贈。儘管政治參與和社會參與在分類上被區分開來，但是社會參與行為可以被視為是促進政治參與的來源，具有隱性的政治參與性質 (Berger, 2009; Ekman & Amnå, 2012)。徐明莉與莊文忠 (2020) 則指出儘管公民參與一般指涉傳統的政治參與行為，例如投票、參與政治集會和示威遊行等，但在政治參與以外，公民參與還包含「政策參與」和「社會參與」兩種類型，政策參與著重公民的理性思辨，以及公民和政府之間的互動溝通，以達到落實民主審議、增進政治信任和改善公共政策品質的目標，例如我國政府所推動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和參與式預算等政策，都與促進政策參與密切相關；社會參與則著重公民對於公共生活的參與，透過社區參與、社團參與和慈善行為等參與方式，提升公民對於公共責任、社區意識和服務意識等認知，實現共同價值並增進合作互助行為，呼應 Putnam (1993) 以社會資本為基礎的公民參與理論。

若將公民參與的範圍聚焦於政治參與上，則可以根據 Barnes 與 Kaase (1979) 的研究，將政治參與分為分為「常規性政治參與」(conven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與「非常規性政治參與」(unconven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²。前者為在官方設定的場域下所進行的政治參與，包含參與選舉、公民投票、公聽會和參加政黨等等，後者則是指「任何目標並非是破壞或威脅自由民主政體穩定的非制度化直接政治行為」，包含簽署請願書、舉辦示威遊行、聯合罷工、抵制特定商品等等。許多實證研究皆指出非常規性參與在許多民主國家正在快速增加，諸如政治消費主義 (political consumerism) 和網路行動主義 (internet activism) 等非常規性政治參與形式逐漸成為民眾公民參與的重要管道 (Marien et al., 2010)。

² 常規性政治參與又可稱為「制度化政治參與」(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非常規性政治參與又可稱為「非制度化政治參與」(non-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以上兩種政治參與方式在理論上具有不一樣的意涵，Beyerle (2014) 認為公民抵抗 (civil resistance) 這種廣泛的非暴力政治抗爭行為（非常規性政治參與），代表著公民不願再與既有的權力機關合作，拒絕以制度內的方式進行課責，以集體的力量對政府施加壓力。從民主治理的角度來看，如果政府要有效解決他們民眾所面臨的問題，政府能夠有效回應民眾需求是一個必要的前提，而相較一般常規性的參與方式，民眾的訴求透過如抗爭等非常規性政治參與，能夠更明確和直接地表達出來。另一方面，民主體系中參與選舉和政黨是在民眾表達意見的主要體制內管道，而在研究中關注除常規性參與以外的公民參與，對比兩者之間的差異在當代社會尤其重要，因為實證研究顯示公民對政府的要求日益增加，並通過非正式的管道表達他們的訴求 (Carothers & Young, 2015)。

二、公民參與動機

公民選擇是否進行公民參與的決定因素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宏觀層面具代表性的理論如政治機會結構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POS)，該理論強調國家政體、法律制度、政黨體系和地區差異等客觀的環境因素，核心理論要素包含社會上有無存在政治管道與政治聯盟者、是否有穩定的菁英體制、權力機關的鎮壓能力、意願等等，並認為過度封閉或開放的體制都無法促使社會運動發生，因為過度開放的體制會容易使民眾進入體制內的參與管道，而過度封閉的體制則會使參與成本過高，阻礙民眾進行政治參與（何明修，2004：57-60）。

而在個體微觀層面，則可以從社會結構 (social structure)、動員機構 (mobilizing agencies) 和文化態度 (cultural attitudes) 等面向 (Norris, 2002)。在社會結構方面，關注焦點在於公民的個人特徵，包含性別、教育程度和職業等面向，以及個人社會地位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高低，因為這影響著民眾是否具有足夠的能力、資源與時間進行公民參與，一般認為資源越豐富者越有機會了解與接觸政治事務，



因此也越有能力與動機從事公民參與，例如 Verba 等人 (1995) 提出資源模型 (resource model) 指出個人的時間、金錢和公民技能對其政治參與相當重要。在動員機構方面，主要強調組織在公民參與上的重要性，包含政黨、教會、非營利組織、學校和公司等與個人社會網路有關的動員因素，例如 Rosenstone 與 Hansen (1993) 指出美國自 1960 年代以來投票率降低是源於政黨動員活動的下降。

在文化態度方面，主要關注的焦點為參與公共事務的動機，這其中所涵蓋的面向相當複雜：有情感性的公民責任和愛國主義，例如 Dalton (2008) 提出公民規範 (citizenship norms) 理論，認為公民對何謂好公民的觀點會影響其參與行為，而年長的公民認為好公民應服從社會規範，因此在政治參與上更偏好常規性政治參與；也有指出公民因預期收益將大於參與成本而參與政治的工具性觀點，例如理性選擇理論 (rational choice theory)。除了以上理論，政治效能感也是常被文獻用於解釋公民參與的政治態度因素，政治效能感代表個人對於自身參與政治能力和政府回應性的評價，許多實證研究均顯示政治效能感越高者越有可能投入公民參與。以上三種個人層次的因素也能夠與 Verba 等人 (1995: 26) 所提出的公民志願主義參與模式 (civic voluntarism model, CVM) 互相呼應。CVM 指出公民不願意進行公民參與的三大因素分別為：他們不能 (they can't)、他們不想 (they don't want)，以及沒有人要求他們參與 (nobody asked)，分別對應社會結構、文化態度和動員機構。本文所關注的貪腐感知因素在公民參與動機上更接近個人微觀層次的文化態度因素，也就是 CVM 中公民是否想要進行公民參與的影響因素。



第三節 貪腐感知如何影響公民參與：政治效能感的中介效果

一、貪腐感知對於公民參與的影響

目前大多數關注腐敗對於公民參與影響的文獻集中於 2013 年之後，且相關學術研究也有著逐漸增加的趨勢，其中較多文獻集中在選舉行為之上，對於廣泛的公民參與行為則相對較晚出現且數量較少，包含本文所關注的腐敗對投票率的影響 (Agerberg, 2019; Caillier, 2010; Carreras & İrepoğlu, 2013; Chong et al., 2015; Giommoni, 2021; Hooghe & Quintelier, 2014; Kostadinova & Kmetty, 2019; Malmberg & Christensen, 2021; Stockemer et al., 2013; Školník, 2020)，以及對於非選舉公民參與行為的影響 (Agerberg, 2019; Bazurli & Portos, 2019; Hooghe & Quintelier, 2014; Kostadinova & Kmetty, 2019; Malmberg & Christensen, 2021; Školník, 2020)。此外，投票決策也是學者們關心的焦點，特別是探討選民為何不使用選票懲罰貪腐候選人的原因 (Bauhr & Charron, 2018; Barros et al., 2020; Cordero & Blais, 2017; De Vries & Solaz, 2017; Ferraz & Finan, 2008; Fernández-Vázquez et al., 2016; Incerti, 2020; Klašnja et al., 2016; Min, 2013; Muñoz et al., 2016; Pavão, 2018; Pereira & Melo, 2015; Sousa & Bezerra, 2013)。

在投票參與的實證研究方面，Agerberg (2019) 針對 2013 至 2016 年的 31 個民主國家進行研究，發現貪腐感知越高的民眾越不可能參與投票，其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興趣等政治態度也越低，而教育程度越高，受貪腐感知的負面影響也越嚴重；Caillier (2010) 調查 2004 年至 2005 年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民眾，發現若民眾認為貪腐情況變得越來越嚴重，則選民將更不可能參與投票；Carreras 與 İrepoğlu (2013) 研究 2010 年 18 個拉丁美洲國家的民眾，發現在選舉舞弊相當嚴重的拉美國家，民眾越不信任選舉制度則投票率也越低；Chong 等人 (2015) 在 2009 年墨西哥地



方選舉前發放披露貪腐資訊的傳單進行實驗，研究結果發現儘管披露資訊有助於對政府課責，但揭露腐敗資訊會使得民眾投票率降低；Giommoni (2021) 分析義大利的 1994 至 2014 地方選舉情形，以主要新聞機構的報章內容衡量貪腐資訊曝光程度，發現貪腐資訊曝光會使民眾投票率降低，並降低候選人數量；Hooghe 與 Quintelier (2014) 對 2002 至 2008 年 11 個中歐與東歐國家的研究發現，貪腐感知對民眾在常規性政治參與上有著負面影響，而貪腐感知的負面影響大於過去威權政體所遺留的影響；Kostadinova 與 Kmetty (2019) 分析匈牙利 2014 年大選後的數據，發現貪腐經驗和對貪腐廣泛程度的認知對民眾參與投票有負面影響；Malmberg 與 Christensen (2021) 對 2016 年全球 31 個民主國家的分析指出，個人貪腐感知對投票率有負面影響；Stockemer 等人 (2013) 針對 1984 至 2009 年全球超過 70 個民主國家，發現若國家對貪腐的控制越佳，對投票率會產生正面影響，投票率相較腐敗程度高的國家約多出二至三成；Školník (2020) 分析 2016 年哥倫比亞數據，發現貪腐感知對投票率有著負面影響。從上述實證研究結果來看，目前探討貪腐感知影響投票行為的實證文獻，基本上皆顯示貪腐感知會減少民眾的投票行為。

在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的實證研究方面，Agerberg (2019) 指出若貪腐感知越高，會增加民眾的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對於高教育程度者增加效果更加明顯；Bazurli 與 Portos (2019) 對 2014 年全球 34 個國家的實證研究顯示，貪腐感知能夠有效促使原本低學歷和低政治興趣的民眾進行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但對於高學歷和高政治興趣的民眾卻有著負面影響；Hooghe 與 Quintelier (2014) 發現腐敗感知對非制度化政治參與有著負面影響，而該負面影響高於過去威權政體遺留的影響；Kostadinova 與 Kmetty (2019) 的研究結果顯示若民眾貪腐感知越高，則會增加民眾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行為，不論該行為是否獲得政府許可；Malmberg 與 Christensen (2021) 指出儘管女性在非制度化政治參與上更加踴躍，但男性在非制度化參與上受貪腐感知的影響更大，受貪腐感知影響的男性更會使用非制度參與



行為表達對政府的不滿；Školník (2020) 發現若貪腐感知越高，民眾越不會參與如示威遊行、社區會議和政治集會等活動，但實際的腐敗經驗卻有著相反的效果。綜上所述，貪腐感知對於民眾在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上的影響，相比於投票參與更加複雜，實證研究顯示貪腐感知可能會增加民眾的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行為，但也有可能使民眾脫離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的場域，且貪腐感知的影響在不同群體之間存在異質性。

Carmo (2018) 指出目前實證文獻探討腐敗對於公民參與的影響時，無法得出一個大致相同的結論，也就是腐敗有可能促進、壓抑或者對於公民參與沒有影響，矛盾的一部分原因來源於不同地區公民對於腐敗行為的容忍度差異，但另一部分則來源於公民對腐敗情形的看法與自身經歷的腐敗經驗，腐敗感知對公民參與的影響可能存在一個「反轉」的現象：當公民認為腐敗情形相對罕見時，他們會嘗試透過投票與集會遊行等集體行動來影響政府，但當公民認為結構性的貪腐相當嚴重時，由於對民主體制與政府機構的運作產生懷疑，腐敗感知反而會產生壓抑公民參與的作用。結合客觀環境因素來看，Dahlberg 與 Solevid (2016) 透過分析 CPI 分數和民眾的貪腐感知，綜合考慮了與貪腐相關的主客觀因素，發現當系統性貪腐相當嚴重時，主觀貪腐感知將不會對實際公民參與行為產生顯著影響，原因在於民眾的行為能力已經被客觀環境因素所壓抑。本文由此提出假設 1：

假設 1：貪腐感知會影響民眾的投票參與/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

許多研究選民為何不以選票對貪腐候選人進行譴責的文獻也同樣發現類似情況，例如 Bauhr 與 Charron (2018) 指出貪腐醜聞越嚴重，會讓從貪腐受益的民眾更加忠誠，並使其他民眾退出選舉譴責的場域；Sousa 與 Bezerra (2013) 指出若選民認為貪腐現象是普遍的，所有候選人都無法避免涉及貪腐，則公民傾向不透過投票參與對候選人的貪腐行為進行譴責。若以腐敗的持續時間來看，Kostadinova



(2009) 指出東歐國家的公民在民主改革後熱衷於投票行為，但在幾屆選舉後發現腐敗情形未獲改善，因而感到無力改變政府，對其投票率產生負面的影響。

二、政治效能感的中介機制

從理性選擇理論 (rational choice theory) 的觀點來看，貪腐感知之所以會使民眾不願意進行公民參與，是因為民眾在選擇是否進行公民參與時，會衡量參與帶來的成本效益 (Aldrich, 1993; Feddersen & Pesendorfer, 1996)。民眾可以透過公民參與影響政府並從中獲益，但投入公民參與需要消耗個人的時間、精力，甚至是金錢。如果民眾認為國家中的普遍存在系統性腐敗，或是認為大多數官員和公務員都是腐敗的，很可能會使民眾喪失對政府和政治體制的信心 (Caillier, 2010)。在這種情況下，公民會認為通過現行體制內的選舉和其他公民參與活動影響政府是徒勞無功的：以投票參與為例，即使民眾可以透過選票使貪腐的官員下台，但如果新當選的官員和前任一樣腐敗，那麼參與投票也無法為自己帶來利益。因此，貪腐感知會阻礙民眾投入公民參與。

但正如 Olson (1965) 針對個人在集體參與行動上的邏輯所提出的搭便車 (free riding) 論點，個人在參與集體行動時需要付出較高的成本和代價，但個人在參與上的邊際影響力卻相當低，因此個人會傾向以搭便車的方式坐等他人的行動為自己帶來利益，而非自己親身參與，在搭便車的觀點下貪腐感知並不會對個人是否進行公民參與產生顯著的影響，因為原本個人的參與意願就已經相當低了。而 Finkel 等人 (1989) 強調理性選擇模型中個人主觀認知的影響，也就是即使客觀上個人行為的影響力接近於零，但個人主觀上可能認為自己在參與上所貢獻的影響力不為零，因此個人會依據自身的主觀認知來決定是否進行參與，而在政治態度上與個人評估自身是否能夠有效影響政府的主觀認知最密切相關的莫過於政治效能感 (political efficacy)。



政治效能感也被稱作政治功效意識，Campbell 等人於 1954 年提出政治效能感的概念，並將其定義為個人認為自己能夠在政治過程中發揮一定的影響力，並願意參與促進改變的過程。政治效能感一般分為外在政治效能感與內在政治效能感，前者包含個人對政府或公共機關回應性的評價，以及對自身是否能影響政府的評價，與政府回應性感知的關係較為密切，後者則代表個人是否認為自己能夠理解政治或政策，以及進行政治參與的能力 (Niemi et al., 1991)。政治效能感經常被認為是預測政治參與的重要變數 (Abramson & Aldrich, 1982), Stekelenburg 與 Klandermans (2013)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描述是什麼促使有些不滿的民眾進行政治參與，而另一群民眾卻沒有進行政治參與，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政治效能感，越相信政治參與與越有效者越可能進行政治參與。吳重禮等人 (1999) 認為政治效能感是個人價值觀中重要的一部分，並指出政治效能感為個人在政治參與上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貪腐感知影響公民參與的機制，比起從客觀上衡量個人進行公民參與的利弊得失，更可能是從個人價值觀層面上對於參與行為產生影響。

此外，政治效能感容易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俞振華與翁定暉 (2017) 指出儘管個人政治態度與公民參與行為具有強烈的聯繫，但同時政治態度也是鑲嵌於社會結構之中，深受社會結構等因素的影響。而貪腐感知為個人對於社會結構中政府廉潔度的認知，因此政治效能感在理論上也會被貪腐感知所影響，也就是公民不會認為自己能夠影響貪瀆的政府。目前在實證研究中，也已經證實腐敗對於公民在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與對於公務員的信任上都有著負面影響，貪腐感知會使民眾覺得自己被排除在政治過程之外，並進而對民主制度產生不信任與疏離感 (Anderson & Tverdova, 2003; Canache & Allison, 2005; Seligson, 2002)。本文由此提出假設 2：

假設 2：貪腐感知對政治效能感具有負面影響。



目前國內外的實證研究大部分認為政治效能感與政治參與之間具有正向影響，如俞振華、翁定暉（2017）針對我國民眾 2004 與 2014 年的選舉與非選舉行為的研究，顯示政治效能感皆有正面影響；Oh 和 Lim (2017) 針對 2009 年韓國公民的調查資料，結果顯示政治效能感能夠將行政參與和政治參與聯繫在一起，³發揮顯著的正向中介作用；Zhu、Chan 與 Chou (2021) 針對 2015-2017 年香港青年的研究，則顯示政治效能感對於激進的政治參與有著顯著正向影響。本文由此提出假設 3：

假設 3：政治效能感越高，民眾越會進行投票參與/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

綜上所述，可以預期政治效能感在貪腐感知影響公民參與的機制上扮演著重要角色。目前已有學者注意到政治效能感作為影響機制的重要性，Kostadinova (2009) 研究腐敗因素對東歐國家投票率的影響時，發現儘管民眾在民主轉型的初期會積極使用投票權利讓貪腐政客下台，但如政府貪腐的情況一直持續且無法改善，將導致民眾的貪腐感知擴散到整個政府而非單一政治人物或政黨，並使民眾會認知到參與投票也無法影響政府並改善現狀，最終讓民眾不願意浪費時間參與無意義投票行為，因此 Kostadinova 提出中介模型分析政治效能感是否為解釋貪腐感知對投票率影響的機制，並發現貪腐感知的確會透過損害政治效能感來降低投票率。

相比於 Kostadinova (2009) 的研究範圍僅限於東歐國家民眾的投票行為，Olsson (2014) 則將研究樣本範圍擴展到全球 33 個國家，公民參與的定義則包含投票參與、制度化參與和非制度化參與，⁴並同樣將政治效能感作為中介變項。Olsson (2014) 指出政治腐敗代表著政府在決策上將以個人利益為導向，而非以民眾的聲

³ 此處的行政參與為讓民眾參與行政的決策和流程，政府賦權的意味較一般政治參與更高。

⁴ Olsson (2014) 的研究中，制度化參與包含「與政治人物聯繫、參與政治會議或集會、積極參與政黨」、非制度化參與則包含「簽署請願書、出於政治、道德或環境原因抵制或故意購買某商品、加入網路上的政治論壇、參與示威遊行」。此處非制度化參與涵蓋範圍更接近本文所測量的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行為。



音和願望進行決策，對於政府回應性的傷害甚鉅。腐敗會損害民眾對於民主運作的滿意度、對於民主制度的信任，以及對於政府執政能力的信心，而同樣受到腐敗的負面影響，且距離公民參與行為關係最密切的政治態度莫過於政治效能感。研究結果顯示不論在投票行為、制度化參與還是非制度化參與中，貪腐感知均有顯著負面影響，而外在政治效能感則都是正向影響。在同時將貪腐感知與外在政治效能感加入模型之後，貪腐感知對於投票行為與制度化參與均維持顯著負面影響，而對於非制度化參與則變得不顯著，顯示在貪腐感知對於非制度化參與的負面影響中，外在政治效能感扮演著重要的影響解釋機制。本文由此提出假設 4：

假設 4：貪腐感知透過對政治效能感造成負面影響，使民眾更不會進行投票參與/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

從理性選擇理論的角度上來看，Olsson (2014) 的研究成果之所以顯示相比於投票參與，政治效能感在投票以外的非制度化參與行為上是更重要的影響機制，其原因在於投票行為並不需要公民付出高昂的參與成本，因此其主觀上對於自身影響力的評估更容易高於對參與成本的評估，導致貪腐感知所引起的政治效能感下降，對投票參與的影響力相對更低。但 Kostadinova (2009) 針對東歐國家進行的研究顯示在貪腐情況嚴重，連選舉公平性可能都難以維持的國家，貪腐感知確實會透過使政治效能感下降，從而對於投票參與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將政治效能感作為影響路徑，比較貪腐感知對於投票參與和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的影響，能夠進一步了解貪腐感知對於公民參與的影響程度，以及民眾對於政府貪腐程度的實際認知。



第四節 人口特徵變數對公民參與的影響

對於公民參與研究而言，年齡是重要的人口特徵變數。一般而言年長者比年輕人更願意參與投票，這是因為政治經驗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獲得的，因此年長者的政治經驗比年輕人更豐富，更能夠理解與自身密切相關的政策問題，並了解政黨提出的政見與政策問題之間的聯繫，年輕的選民這在這方面較缺乏經驗，因此投票意願相對更低 (Niemi & Barkan, 1987; Wolfinger & Rosenstone, 1980)。從整體公民參與來看，除了示威活動等較激進的參與形式外，年長者也比年輕人更經常地參與政治活動 (Rosenstone & Hansen, 1993; Tolbert & McNeal, 2003)，Dalton (2008) 指出中老年人相較於年輕世代，在公民規範上更偏好「義務規範認知」(duty-based citizenship norms)，年輕世代則更偏好「參與規範認知」(engaged citizenship norms)，前者代表更願意遵守社會秩序規範，包括定期參與投票與繳稅等等，後者則與非選舉政治參與的關係更密切，例如幫助弱勢和參與集會遊行等等。在我國實證研究方面，徐明莉與莊文忠 (2020) 則指出我國年長者在整體公民參與上比年輕人來得更多。

在性別方面，男性通常比女性更頻繁地投入政治參與 (Burns et al., 1997)，而在參與形式上，女性一般偏好如投票參與等體制內的參與行為，而男性則更偏好更激進的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形式 (Hooghe & Stolle, 2004)。胡佛 (1985) 研究結果顯示男性相比女性更關切政治，在政治參與上也更加踴躍；徐明莉與莊文忠 (2020) 則顯示在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中，男性在政策參與上頻率顯著較高，女性則在慈善參與上較男性頻繁。

教育程度通常被認為是影響政治態度和公民參與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對於選舉與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均有正相關 (Verba et al., 1995)。教育程度通常與個人的政治態度呈正相關，受過高等教育的公民的政治經驗、政治知識和相關能力通常更



強 (Hillygus, 2005), 在公民參與上通常也更踴躍。在我國實證研究方面，胡佛(1985)指出教育程度對於政治參與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果；徐明莉與莊文忠(2020)也顯示高學歷者在整體公民參與上比低學歷者來得更多。

在政黨認同方面，大多數研究都聚焦在其與投票參與之間的聯繫，一般政黨認同越強烈的民眾，自然越關心選舉結果，也越有動機參加投票活動。Abramson 與 Aldrich (1982) 指出美國在 1960 至 1980 年間總統大選投票率下降，原因之一是由於民眾的政黨認同降低。蔡佳泓 (2001) 指出我國省長選舉中政黨偏好強度是顯著的影響因素。在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方面，徐明莉與莊文忠 (2020) 顯示在整體公民參與頻率上，泛藍與泛綠政黨認同者皆高於政黨中立和其他政黨認同者。



第三章 資料介紹、分析方法與模型設計

本章將介紹本文的研究資料「2018-2020 年民眾定群追蹤面訪調查」(TIGCR-PPS 2018-2020)，以及本文所使用的研究分析方法，並歸納出本文的研究理論模型框架和對應的研究假設。

第一節 研究資料介紹

本文分析資料為 2018 至 2020 年臺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 (Taiwan Institute for Governance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IGCR) 推動的民眾定群面訪追蹤調查 (Political Polarization Survey, TIGCR-PPS)，TIGCR-PPS 以全臺 18 歲以上成年民眾作為抽樣對象，是我國罕見的長期定族追蹤調查資料。該計畫的目的為以調查政治態度為核心，圍繞著政治極化、數位科技、資訊傳播與政治態度互動等議題進行調查，以作為社會科學領域研究的基礎資料。⁵

TIGCR-PPS 的抽樣對象為年滿 18 歲以上的我國臺灣地區國民(不包括離島地區)。該計畫已於 2018 年至 2020 年進行三波的追蹤訪問調查。在抽樣方法方面，採用了分層等比例隨機抽樣方法，使用人口特徵和區域特徵來確定不同層次(鄉鎮市區、村里和家戶)的抽樣數量。2018 年第一波抽樣與 2019 年額外新抽樣本採門牌地址清冊抽樣，抽樣具體執行過程為先透過人口特徵與區域特徵進行集群分析 (cluster analysis)，確定各鄉鎮市區、村里和家戶等不同層次的抽樣數量，再以抽取率與單位大小成比例 (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 的方式分層依序抽出

⁵ 本文使用的資料全部（部分）係採自「台灣政經傳播研究」多年期研究規劃：2018-2020 年民眾定群追蹤面訪調查資料 (TIGCR-PPS2018-2020)。台灣政經傳播研究 (TIGCR) 多年期計畫主持人為國立政治大學黃紀教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張卿卿特聘研究員，TIGCR-PPS2018-2020 是以全台各地民眾為訪問調查對象，自 2018 年起至 2020 年間蒐集受訪者對於政治態度、經濟評估、傳播行為的跨年度計畫；詳細資料請參閱 TIGCR 網頁：<http://tigcr.nccu.edu.tw/>。作者感謝上述機構及人員提供資料協助，惟本文之內容概由作者自行負責。

鄉鎮市區、村里和門牌地址，最後派遣訪員訪查抽出門牌地址的家戶，並以洪氏戶中抽樣法從家戶中抽出最終的受訪者，調查受訪意願並辦理訪問，2018 年第一波調查共計成功完成 2,484 份問卷。



各年度問卷皆有調查受訪者參與次年度追蹤調查的意願，以此建立長期追蹤調查清單，並於隔年執行追蹤訪問。在 2018 年完成訪問的 2,484 位受訪者中，有 2,132 位受訪者願意接受 2019 年的訪問，到了 2019 年則實際有 1,839 位受訪者完成訪問，這其中有意願繼續參加 2020 年調查的受訪者為 1,733 位，實際完成追蹤訪問者為 1,579 位。TIGCR-PPS 2018-2020 各波次的追蹤訪問目標數、完成數、完成比例等資訊，如表 2-1 所示。本研究所採用的分析樣本，為 2018 至 2020 年三波調查均有參加的民眾，並從中篩選出三年均有回答與本文研究相關題項者者，最終本文用於分析的有效樣本數共 1,228 人，佔 2018 至 2020 年皆有受訪的成功樣本數 77.77%。⁶

⁶ TIGCR-PPS 在 2018 年執行第一波獨立樣本訪問時，因執行結果未達目標，考量到追蹤樣本流失率，於 2019 年再辦理一次獨立樣本訪問，獨立樣本抽樣與執行方式與 2018 年相同。資料中無論是 2018 年就加入或是 2019 年才加入定群追蹤的樣本，都被合併在同一資料檔中。由於本文的分析對象是 2018-2020 三年間皆有接受訪問的受訪者，此處暫不討論自 2019 年起才加入定群追蹤的受訪者，實際分析過程也將 2019 年起加入的樣本刪去。

表 2-1 TIGCR-PPS 2018-2020 三年度定群追蹤樣本完成數一覽表

調查波次	時間	調查模式	預期完成數	成功樣本數	完成率	願意參與 次年調查 人數
第一波	2018.7.9- 2018.11.23	面訪	3,750	2,484	66.24%	2,132
第二波	2019.5.27- 2019.10.20	面訪	2,132	1,839	86.26%	1,733
第三波	2020.6.1- 2020.10.22	面訪	1,733	1,579	91.11%	1,50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資料庫（TIGCR-PPS2018-2020）及郭銘峰、徐子傑（2022）。

表 3-1 為本研究有效樣本的個人特徵分布，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政黨偏好。由於個人特徵在三年的時間尺度下，一般不會出現劇烈變動的情形，因此表 3 個人特徵數據以 2018 年受訪者填答結果為準。在性別方面，男性占比約為五成六，性別比相較全臺人口分布略高；在年齡方面，20 至 39 歲的青年人與 40 至 59 歲的中年人約各占樣本四成，60 歲以上的老年人約占樣本兩成；在教育程度方面，國中以下教育程度者約占兩成，高中職者約占三成，大專院校及以上者約占五成，與全臺人口教育程度分布相近；在政黨偏好方面，有大約五成受訪者表示自己無政黨偏好，泛綠陣營與泛藍陣營各占兩成五與兩成一，其他政黨者則占比不足 4%。

表 3-1 TIGCR-PPS 2018-2020 年定群追蹤樣本人口特徵分布 (N=1228)

變數名稱	屬性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692	56.35%
女性		536	43.65%
年齡			
20 至 39 歲		493	40.15%
40 至 59 歲		477	38.84%
60 歲以上		258	21.01%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112	9.12%
國、初中		120	9.77%
高中、職		354	28.83%
專科		158	12.87%
大學及以上		484	39.41%
政黨偏好			
泛綠政黨		270	21.99%
泛藍政黨		311	25.33%
其他政黨		44	3.58%
無偏好		603	49.1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資料庫 (TIGCR-PPS2018-2020)。

目前我國在公民參與領域的量化實證研究鮮少使用 2016 年之後的資料，少數使用較新資料的研究也大多為橫斷面研究 (cross-sectional study)，同時包含個體內時間變化與個體間資訊的定群追蹤研究則相對罕見。相比於包含多個體，但只有單一時間點的橫斷面資料 (cross-sectional data)，或是包含多時間點，但只有單一個體的時間序列資料 (time series data)，同時包含多個個體與時間點的定群追蹤資料 (panel data) 在分析上更具有優勢，例如能夠同時關注個體內變化與個體間差異，而橫斷面資料則無法關注個體內變化，只能假定在單一時間點下，具有相同條件的個體在依變項上都具有相同的期望值，忽略不同個體隨時間變化的異質性。此外，定群追蹤資料在分析上也能夠控制未觀察到的變量，或是隨時間變化但不因個體而異的影響因素，避免因遺漏變量而錯估解釋變量對於依變量的影響 (Hsiao,



2022)。因此，本文以較新的定群追蹤資料進行分析，不僅可以驗證本文所關注的理論框架在如今的時空背景下是否成立，對於實務面的啟發與貢獻也會更具有說服力。

第二節 定群追蹤資料的分析優勢與常見方法

由於定群追蹤資料的特性，因此若將其當作橫斷面資料進行混合迴歸 (pooled regression)，除了同一個體在不同時間點的觀察值誤差項容易存在自相關 (autocorrelation) 之外，也忽視了個體間未被觀察到的異質性，而該異質性若與解釋變量相關，將使迴歸分析無法得到一致估計。目前定群追蹤資料的分析方法主要可分為兩種，分別為固定效果模型 (fixed effect models, FE) 與隨機效果模型 (random effect models, RE)。以上兩種模型皆可以公式 (1) 進行說明：

$$y_{it} = \beta_0 + \beta X_{it} + \delta Z_i + u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公式 (1) 中， y_{it} 與 X_{it} 為研究所關注的因個體與時間而異的依變量與自變量， Z_i 為如性別等不因時而異的人口特徵變數， u_i 為個體未被觀察到的不因時而異的異質性， ε_{it} 則是因個體與時間而異的誤差項， u_i 與 ε_{it} 兩者合稱複合誤差項 (composite error term)。

固定效果模型將 u_i 視為一組固定的數值，能夠透過一階差分 (first difference) 或加入 $n-1$ 個體虛擬變量 (dummy variable) 等方法消除 u_i ⁷，以控制個體不隨時間變化的異質性，因此允許 u_i 與 X_{it} 及 Z_i 存在相關性，但需要注意 δZ_i 也會一併被消除，導致無法估計不因時而異的因素對依變量的影響 δ ，且由於模型中包含許多虛擬變量，模型自由度會受到明顯的影響。隨機效果模型則將 u_i 視為具有指

⁷ 若模型無截距項則為 n 個個體虛擬變量。



定機率分布的隨機變量，因此得以保留 δZ_i 進行估計，且模型損失的自由度也較小，估計效率也較高，但需要滿足 u_i 與 X_{it} 及 Z_i 不存在相關性的假設，否則參數估計將出現偏誤。

在選擇要以固定效果模型或隨機效果模型進行分析時，一般使用 Hausman test 進行檢驗，其原理為檢驗固定效果模型估計量 $\hat{\beta}_{FE}$ 與隨機效果模型估計量 $\hat{\beta}_{RE}$ 在是否存在顯著差異，由於若 u_i 與 X_{it} 及 Z_i 不存在相關性，則兩種模型的估計量皆會收斂於真實的參數值，因此若兩者無顯著差異，則代表應使用估計效率更高的隨機效果模型進行分析，反之則應使用固定效果模型進行分析 (Allison, 2009)。

第三節 兼顧組內與組間效應：固定與隨機效果並用法之運用

固定效果模型和隨機效果模型各自具有優缺點。固定效果模型能夠避免遺漏變項的問題，但其僅關注個體內部變化的影響，無法對個體特徵不隨時間變化的影響進行估計。隨機效果模型可以估計個體特徵不隨時間變化的影響，但在實際分析中往往難以滿足其統計假設前提。本文在選擇分析方法時，首先進行了 Hausman test 檢驗。檢驗結果顯示支持使用固定效果模型（兩種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存在顯著差異）。

然而，由於固定效果模型在估計時，會同時將依變項 y_{it} 與自變項 X_{it} 與 Z_i 轉化為個體均值之差，因此若個體各年度的依變項均無變化，固定效果模型分析將會刪除該個體的所有觀察值，導致分析樣本將大幅度縮小，降低研究樣本的代表性。

⁸在研究變數完整性方面，在三年的時間尺度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居住地等變項幾乎不會有變化，因此使用固定效果模型難以分析這些變項的組內效果，而

⁸ 若本文使用固定效果模型分析，將導致分析投票參與的個體數量僅剩 174 人，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則僅剩 310 人，樣本中個體數量減少幅度分別為 85.83% 與 74.76%。

模型的特性也使其無法分析組間效果，導致研究模型無法維持變數完整性。

Neuhaus 與 Kalbfleisch (1998) 提出在隨機效果模型中加入固定效果估計量，以釐清固定效果模型與隨機效果模型分析結果的差異。Allison (2009) 在其著作中進一步介紹該方法的分析應用方式，並將其稱為混合法 (hybrid method)。我國學界對該方法的採用相對少見，少數採用該分析方法的定群追蹤實證研究如劉嘉薇與黃紀(2012)分析雙親政黨偏好如何形塑大學生的政黨偏好，郭銘峰與王鼎銘(2014)對日本眾參兩院選舉結果進行定群追蹤分析等等。除了混合法以外，Sjölander 等人 (2013) 將此種分析方法其稱為組間-組內模型 (between-within model)，郭銘峰與王鼎銘(2014)則將 hybrid method 譯為「固定與隨機效果並用法」。為避免混淆，本文將此方法統稱為「固定與隨機效果並用法」。

在固定與隨機效果並用法中，僅將會隨時間改變的自變量拆解為個體組內平均 (group mean, \bar{X}_i) 與組內平均之差 (deviation from group mean, $X_{it} - \bar{X}_i$)，而不將依變項進行轉換，考慮到同一個體的觀察值可能存在自相關，因此使用隨機效果模型而非最小平方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進行估計。相比於固定效果模型，使用混合法進行分析可以維持資料與模型變量的完整性，並在線性迴歸中得到與固定效果模型一致的估計，而在大部分的實際分析情況中，使用邏輯迴歸與泊松迴歸也能得到相當近似的估計結果 (Goetgeluk & Vansteelandt, 2008)。固定與隨機效果並用法的公式表述如式 (2)。由於本文依變數涵蓋二元變數（投票參與）與計數變數（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因此 y_{it} 需分別代入 $\log(\frac{p_{it}}{1-p_{it}})$ 與 $\log(\mu_{it})$ 。

$$y_{it} = \beta_0 + \beta_b \bar{X}_i + \beta_w (X_{it} - \bar{X}_i) + \delta Z_i + u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第四節 探索影響機制：中介效應分析之概念與方法

根據 Baron 與 Kenny (1986) 提出的逐步迴歸法，本文中介效應分析主要可分為以下四步：

一、檢驗貪腐感知對公民參與的影響：第一步驟為檢驗模型中總效果的存在，該影響路徑簡稱為 c 。根據 MacKinnon 等人 (2007) 的研究，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可能由於效果相反，出現不一致中介 (inconsistent mediation) 的情況而互相抵消，導致總效果不顯著，Hayes (2017) 也對將總效果是否顯著作為檢驗中介效應先決條件的做法提出批評，因此總效果顯著並非必須滿足的條件。第一步檢驗公式如式 (3-1) 所示：

$$y = \beta_0 + cX + \varepsilon \quad (3-1)$$

二、檢驗貪腐感知對政治效能感的影響：這一步驟將中介變項作為依變項，檢驗自變項對中介變項的影響，該影響路徑簡稱為 a ，迴歸係數 a 在檢驗步驟中必須為顯著，以驗證自變數貪腐感知對中介變數政治效能感具有顯著影響。第二步檢驗公式如式 (3-2) 所示：

$$M = \beta_0 + aX + \varepsilon \quad (3-2)$$

三、同時在模型中放入貪腐感知與政治效能感，檢驗其對於公民參與的影響。這一步驟的目的在於檢驗政治效能感到依變項的影響路徑是否顯著，該影響路徑簡稱為 b ，當迴歸係數 a 與 b 同時顯著時，代表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自變數貪腐感知對於依變數公民參與的影響，中介變數政治效能感確實為重要的影響機制。James 與 Brett (1984) 認為第三步檢驗影響路徑 b 時，不一定要在模型中同時放入自變數，但由於中介變數對依變數有顯著影響可能是由於自

變數同時影響中介變數和依變數所導致的，因此一般中介效應檢驗第三步都會同時放入自變數與中介變數。第三步檢驗公式如式 (3-3) 所示：

$$y = \beta_0 + c'X + bM + \varepsilon \quad (3-3)$$



四、在完整的研究模型中，貪腐感知對公民參與的直接效果應該為零，其對於依變項的影響完全透過中介變項（直接效果路徑簡稱 c' ）。根據 Kenny 等人 (1998) 的研究，除非研究者只期望完全中介 (complete mediation) 的結果，而不考慮部分中介 (partial mediation) 的可能性，否則第四步的檢驗要求不一定需要被滿足。⁹

除了逐步迴歸法之外，也有其他許多檢驗中介效應的方法，例如 Sobel (1982) 提出的 Sobel Test，該檢驗方式的原理為檢驗路徑 a 與路徑的乘積是否顯著，以及更為複雜的拔靴法 (bootstrapping) 與蒙地卡羅法 (Monte Carlo method)。本文之所以選擇逐步迴歸法檢驗中介效應，主要是由於同時結合邏輯迴歸或泊松迴歸等廣義線性迴歸模型、固定與隨機效果並用法，以及中介效應分析的文獻較為少見，使用逐步迴歸法檢驗中介效應較為簡潔易懂。此外，根據 MacKinnon 等人 (2002) 對於中介效應分析方法的比較，逐步迴歸法具有較低的型一錯誤 (type I error) 機率，因此使用逐步迴歸法能以較為嚴格的標準檢視中介效應是否存在。

⁹ 完全中介意為自變項完全透過中介變項影響依變項（僅存在間接效果），部分中介則是除了間接效果以外，自變項仍對依變項有直接效果。



第五節 貪腐感知影響公民參與之模型設定

根據本文對於相關文獻的梳理，可以假設貪腐感知對於投票參與，以及更廣泛的非選舉公民參與行為，皆具有負面的影響。在投票參與方面，公民願意花費一定的時間與成本出門投票，是希望選出自己心中理想的官員或代議士，並以投票的方式對政府進行課責，但如果公民認為政府貪汙腐敗的情形嚴重，則可能認為選舉是被黑金政治所操弄的，抑或是認為所有黨派或候選人都是貪腐的，誰當選都無法改變貪腐現狀，因此即使自己參與投票，也無法達成對政府課責或選出理想的官員等參與投票的目的，也就是投票作為一種公民影響政府的方式，在公民心中的價值因貪腐感知而受到損害。正如 Sundström 與 Stockemer (2015) 所言，若選民對政府的腐敗感知越強烈，則會降低其心中的選票價值，從而不願意出門投票。

而在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方面，相比於代議民主下的投票行為，選民是以更多元且直接的方式，嘗試在政策或公共議題上影響政府，所採行的方式包括但不限於聯署、抵制、參與公聽會、集會遊行等等。相比於投票參與，公民在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上通常需要花費更高的時間成本，試圖以更直接的方式在自己關心的公共議題上影響政府的決策，但如果選民認為政府是腐敗的，可能會使其認為政府決策都是被特定利益團體或財團所操弄，因此難以透過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的方式來影響政府，甚至反而會使其遭受來自於特定利益團體或政府的報復與打壓，因此貪腐感知會使人民更不願意以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的方式影響公共議題。

總結而言，貪腐感知對選舉與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的影響，其關鍵的機制在於民眾是否相信能夠透過參與來影響政府，也就是政府是否具有回應性。莊文忠 (2010) 指出政治效能感是人民是否願意自發性參與公共事務的關鍵，其分為內在政治效能感與外在政治效能感兩大部分，前者是民眾對自我政治能力的認知，後者是民眾對於政府是否具有回應性的認知。因此，本文以外在政治效能感作為解釋為

何貪腐感知能夠影響公民參與行為的機制，當公民認為貪腐的政府深陷於黑金政治的泥沼，因此難以有效回應公民的需求時，公民會更不願意花費時間與精力投身於公民參與，以免浪費資源在無效的參與上。



綜上所述，本文研究模型框架如圖 4-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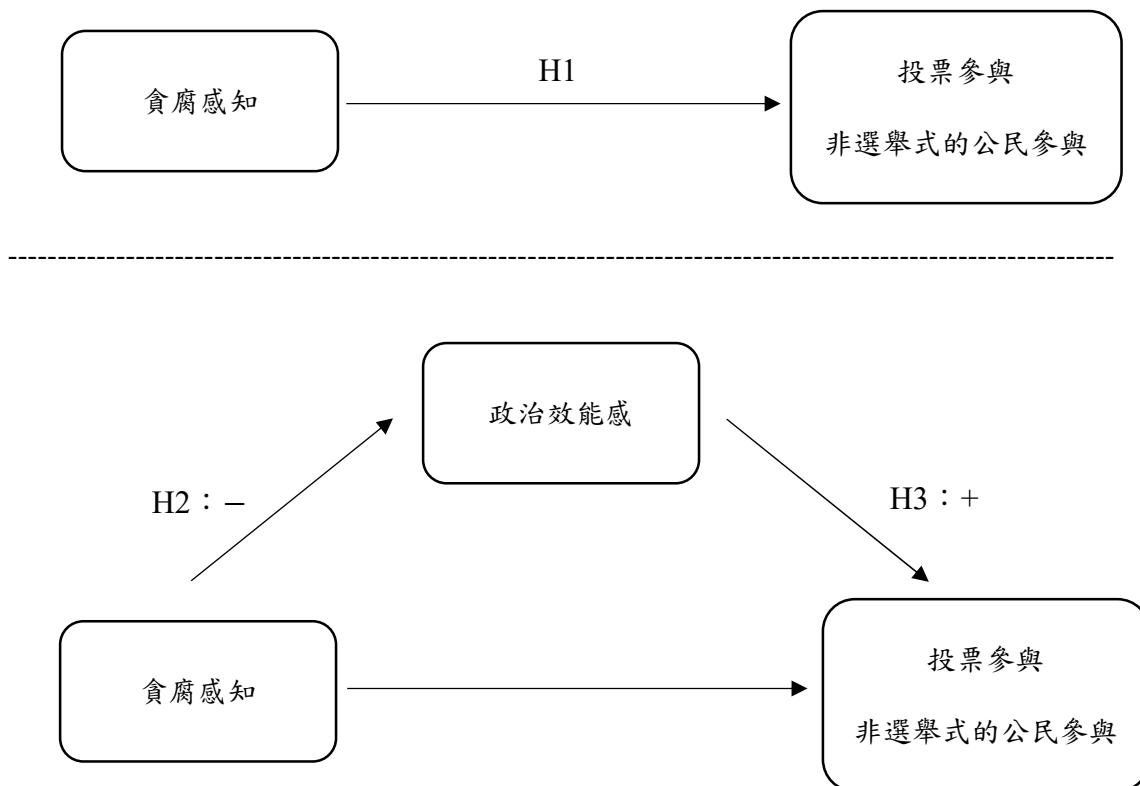


圖 4-1 貪腐感知影響公民參與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第四章 公民參與、貪腐感知與政治效能感之測量及 變化趨勢

本章旨在介紹本文重要研究變數的操作型定義，並初步分析變數的年度變化，觀察其結果是否符合現實觀察及理論假設。

第一節 投票參與及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的測量與年度變化

在依變項方面，2018 年至 2020 年間的定群追蹤研究中，共包含兩屆選舉，分別是 2018 年的九合一大選與 2020 年的總統立委大選。因此本文對於投票參與的測量題項，為受訪者是否實際參與我國於 2018 年舉行的地方選舉與公民投票，以及是否實際參與 2020 年的總統選舉，將實際有參與投票者編碼為 1，無參與投票者編碼為 0，建立 2018 與 2020 年兩年度的二元變數 (binary variable)。¹⁰ 1,228 位受訪者於 2018 與 2020 年兩年度的投票參與比例如圖 5-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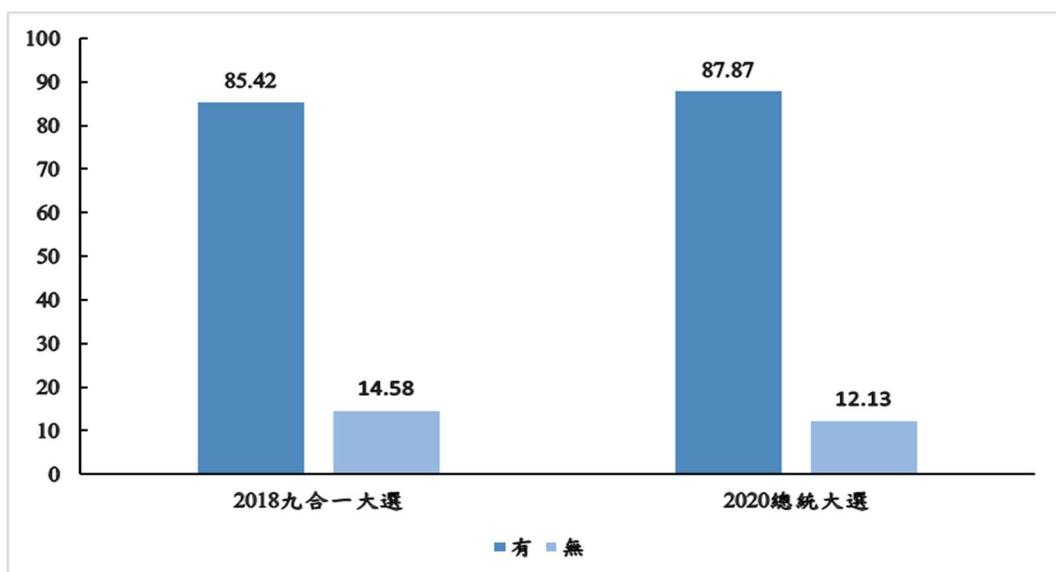


圖 5-1 2018 年九合一大選及 2020 年總統選舉投票率 (單位：%)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參考自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資料庫 (TIGCR-PPS2018-2020)。

¹⁰ 為確保兩次投票中受訪者的年齡區間一致，以及考慮到公職人員選舉與公民投票意涵上的差異，本文將 2018 年僅參加公民投票而無參加地方公職人員投票的 12 位受訪者排除於分析之外。



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則是以受訪者過去一年因公共議題而進行公民參與的次數作為測量題項：「您在最近一年中，參加像是環保、勞工、人權、年金改革這種的社會或公共議題相關的活動，次數大概有幾次？像是實際參加的，例如公聽會、遊行或抗爭，或是在網路連署的、或者是看直播的，都算」作為操作化的題項，為一計數變數 (count variable)。1,228 位受訪者於 2018 至 2020 年三年間平均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次數變化如圖 5-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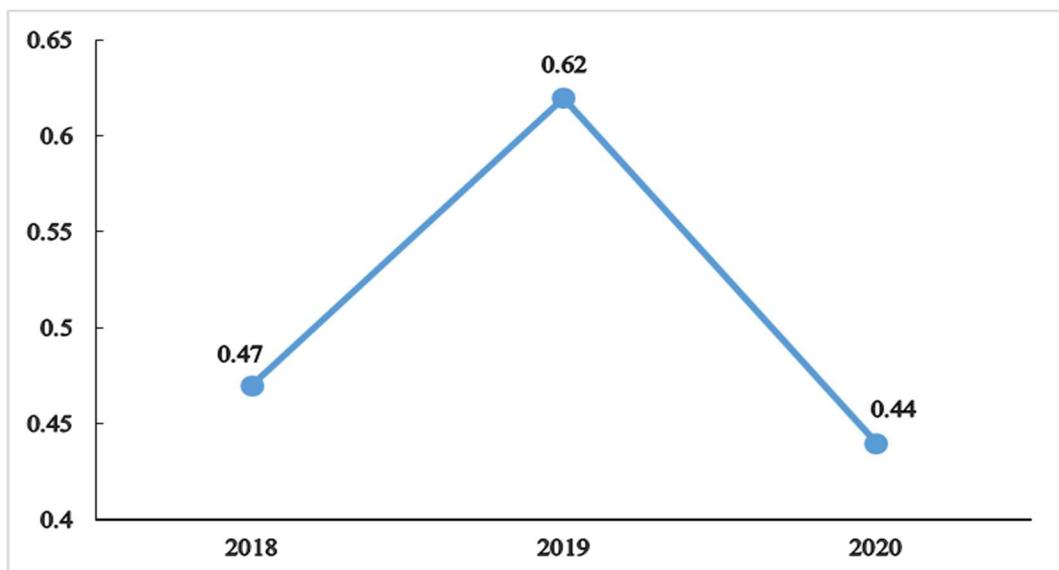


圖 5-2 2018 年至 2020 年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平均次數變化趨勢（單位：次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參考自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資料庫 (TIGCR-PPS2018-2020)。

在投票參與上，本文分析樣本的投票率高於全國母體數據（兩年度全國投票率分別為 66.95% 與 74.90%），可能是由於願意連續三年接受訪問者，本身就具有比一般民眾更願意從事公民參與的特質，投票率的差異則可能來源於中央選舉與地方選舉的差異。而從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來看，儘管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包括廣泛的公民參與行為，集會遊行只是其中之一的參與形式，但樣本的變化趨勢與全國集會遊行數據具有相似之處，兩者均在 2018 年前後出現明顯的先升後降的起伏波動



¹¹，2018 至 2019 平均參與次數增長約 31%，而 2019 至 2020 則下降約 29%。

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的劇烈變化，反映了我國 2018 至 2020 年民心思變的社會氛圍。在此時期中，如「韓流」等由非典型政治領袖主導，主張反菁英及鼓吹直接民主的民粹浪潮於 2018 年迅速崛起，又於 2020 年迅速消退。而在制度方面，《公民投票法》於 2017 年底下修公民投票的提案、聯署、通過和投票年齡門檻，導致 2018 年的成案的公投題目高達 10 個，橫跨環保、食安、能源與性別平權等議題，使得相關利害關係團體也在此時期更加積極地四處奔走，宣揚理念並舉辦相關活動，增加民眾對於相關公共議題的認知與興趣，使民眾更願意針對公共議題發表意見，或有更多機會參與相關的公民參與活動。

第二節 貪腐感知及政治效能感的測量與年度變化

本文在「貪腐形象感知」的測量題項選擇上，係參考莊文忠、余致力（2017：50）、Heidenheimer (1989: 159) 等人的定義：貪腐發生於當公務員收受賄賂並提供給行賄者獎勵，以至於損害公共利益時。因此，本文以「有人說：『現在到政府機關辦事情，不送紅包很難辦得通。』」作為貪腐形象感知操作化的題項。

從本文前揭有關貪腐的文獻回顧可以得知，行政貪腐與政治貪腐具有密切的相關性，且行政機關的清廉形象能夠廣泛影響我國民眾對於政府機關和首長的清廉形象認知，余致力（2006）認為在民主政治的委託與代理人關係中，官僚相比於民選首長、民意代表和政務官員，與人民的委託代理關係最遙遠，更需要受到監督與課責，因此人民對於官僚廉潔性的認知是相當值得關注的議題。此外，我國「收紅包」的文化在相當程度上能夠代表民眾所認知到的貪腐行為：黃東益等人（2011）

¹¹ 受訪者平均參與次數高峰出現在 2019 年，而非母體集會遊行數據顯示的 2018 年，則可能是由於調查問題為詢問受訪者過去一年間的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行為，因此受訪者的回答一部分反映了調查年度前一年的參與情形。



調查顯示有四成受訪者親身經歷或聽聞送禮、送紅包與宴請公務人員等貪腐情形；余致力等人(2018)建構民眾的貪腐認知類型時，將公部門收受賄賂作為所有認知類型下的重要分析題項；陳俊明等人(2021;2022)在廉政感知調查的歷年調查中，皆將公務人員收受民眾紅包列入測量民眾貪腐感知的四種常見貪腐行為之中，且發現民眾認為公務人員收受民眾紅包行為的嚴重程度正在逐年攀升。

在測量貪腐的方法上，包含對社會大眾和標的人口的貪腐感知調查、對於貪腐事件發生率的估計、由專家對整體貪腐狀況進行評估等方式。本研究的貪腐感知測量方法屬於對抽樣對象貪腐感知的調查，儘管貪腐認知並不完全等同於實際的貪腐情形，但是由於貪腐行為具有隱密性，貪腐調查也具有相當程度的敏感性，因此採用如民眾貪腐感知等主觀測量的方法進行貪腐調查，也是目前實務上測量貪腐的主流方法之一（莊文忠、余致力，2017）。另一方面，本研究題項為公民個人的貪腐感知而非實際經驗，因此能夠緩解貪腐調查具有敏感性的問題，讓受訪者能夠在較無顧慮的情況下，評估該貪腐行為在現實情況中的嚴重程度，透過詢問受訪者對於公務員收受紅包的印象作為測量題項，一方面避免了貪腐認知具有模糊性的問題（收受紅包無疑是貪腐行為），另一方面詢問「印象」的題項的敏感性較低，相較於詢問貪腐實際經驗，受訪者回覆虛假答案或不願回答的可能性也較低。

在政治效能感方面，黃信豪（2006：119-120）指出外在政治效能感相較於內在政治效能感，與民眾對政府回應性的感知的關係更為密切。¹²因此本文參考其測量外在政治效能感中的「政府不關心」（對政府回應性的評估）與「沒有影響力」（對個人影響政府能力的評估）兩個面向，以「有人說：『我們一般民眾對政府的作為，沒有任何影響力。』請問您同不同意？」，以及「有人說：『政府官員不會在乎我們一般民眾的想法。』請問您同不同意？」作為衡量政治效能感的操作題項。

¹² 內在政治效能感代表個人對自身在政治事務上了解程度的評價。

兩題項 2018 至 2020 年各年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alpha 數值分別為 0.63、0.65 與 0.64，均未低於低信度的門檻 (Nunnally & Bernstein, 1994)，因此本文將兩題項取算術平均數作為研究模型中的政治效能感變數。



以下題項的選項均為李克特 1-4 量表 (Likert Scales)，對應的選項從 1 至 4 為「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考慮到分數越高，代表該變數的程度也越高，更能夠使人直觀理解分數的高低意義，因此本文對貪腐感知題項的選項進行反向處理，使數字的解讀方式為題項分數越高，貪腐感知或政治效能感的數值也越高。表 4 為相關題項的描述性統計圖表，可以觀察到貪腐感知逐年降低，而政治效能感逐年升高的現象，反映了我國政府在廉政和增加政府回應性的政策措施上所取得的成效。



表 4-1 變數測量與描述性統計

構面	題項	李克特量表	各年平均值	各年標準差
貪腐感知	有人說：「現在到政府機關辦事情，不送紅包很難辦得通。」	1 至 4	2018: 2.14 2019: 2.11 2020: 2.04	2018: 0.61 2019: 0.58 2020: 0.56
	有人說：「我們一般民眾對政府的作為，沒有任何影響力。」請問您同不同意？	1 至 4	2018: 2.61 2019: 2.74 2020: 2.78	2018: 0.69 2019: 0.62 2020: 0.58
政治效能感	有人說：「政府官員不會在乎我們一般民眾的想法。」請問您同不同意？	1 至 4	2018: 2.39 2019: 2.53 2020: 2.58	2018: 0.70 2019: 0.63 2020: 0.61
	平均值	-	2018: 2.50 2019: 2.64 2020: 2.68	2018: 0.59 2019: 0.54 2020: 0.5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資料庫（TIGCR-PPS2018-2020）。



第五章 貪腐感知對公民參與的影響：兼論政治效能 感之中介效果

根據本文第四章的圖表顯示，在 2018 至 2020 年間，我國民眾對貪腐感知、政治效能感和公民參與均呈現明顯的變化趨勢，2018 至 2020 三年間我國民眾整體在貪腐感知、政治效能感與公民參與上均呈現明顯的變化趨勢，但是僅依靠變化趨勢的分析難以清楚解釋三者之間的關係，因此需要進一步使用迴歸分析進行驗證。由於一般橫斷面研究的實證模型無法處理同一個體在不同時間的觀察值之間的自相關問題，也無法分析同一個體在不同年度間的變化，因此本文將採用「固定與隨機效果並用法」進行分析，當依變數為是否投票的二元變數時，在固定與隨機效果並用法的框架下採用邏輯迴歸 (logistic regression)，為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次數時採用柏松迴歸 (poisson regression)，為政治效能感時則使用普通最小平方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在研究變數處理上，由於貪腐感知、政治效能感與政黨偏好隨時間變化較大，因此在模型中將其拆解為「組內平均」及「與組內平均之差」，其餘如性別、年齡與教育程度等控制變數則因為隨時間變化較小，因此不進行拆解處理。

根據以下兩節表 5-1 與表 5-2 的迴歸結果，投票參與模型中的 LR test of Ho : rho = 0 的 p 值均小於顯著水準 0.05，顯示模型中殘差 (residuals) 之間的相關性顯著不為零，而非選舉模型中的 LR test of Ho : alpha = 0 的 p 值也均小於顯著水準 0.05，顯示迴歸估計結果與使用橫斷面柏松迴歸分析的估計結果存在顯著差異，以上檢驗結果均支持使用定群追蹤研究分析方法的必要性。

本文的核心研究目的為探討貪腐感知是透過何種機制，對投票和其他公民參與行為產生影響。在理論方面，本文認為影響機制是因為民眾感知到政府貪腐情況，



並認為政府對人民缺乏充分的回應性，而當公民對政府的回應性評價下降，他們將會認為透過投票或其他公民參與方式影響政府是徒勞無功的，最終導致公民不願意花費時間和成本透過投票或其他公民參與方式來影響政府。為了驗證上述影響機制是否成立，除了使用固定與隨機效果並用法進行定群追蹤分析，本文還將同時並用逐步迴歸法，將貪腐感知作為自變數，投票參與和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作為依變數，同時以政治效能感作為中介變數，以驗證上述影響機制理論框架的是否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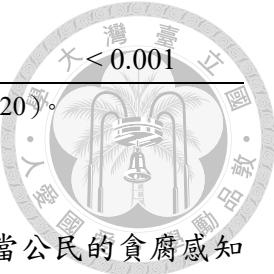
第一節 貪腐感知對投票參與的影響

表 5-1 為貪腐感知對於投票參與的中介效應分析結果，其中模型 1 至模型 3 均使用固定與隨機效果並用法進行分析。模型 1 透過分析貪腐感知對於投票參與的影響，並且先不加入中介變數政治效能感，以檢驗貪腐感知影響投票參與的總效果（路徑 c ），模型 2 則是檢驗貪腐感知對於政治效能感的影響（路徑 a ），模型 3 則是放入所有變數，檢驗是否存在顯著的間接效果（路徑 b ），以及貪腐感知影響投票參與的直接效果是否顯著（路徑 c' ）。若路徑 a 與路徑 b 迴歸係數均顯著，則代表政治效能感為中介變數成立。

表 5-1 投票參與的固定與隨機效果並用法之中介效應分析結果

	投票參與=Y；貪腐感知=X；政治效能感=M					
	(1) X → Y		(2) X → M		(3) X → M → Y	
	$\hat{\beta}$	(S.E.)	$\hat{\beta}$	(S.E.)	$\hat{\beta}$	(S.E.)
貪腐感知						
貪腐感知（組內平均）	-0.27	(0.25)	-0.25*** (0.03)	-0.20	(0.26)	
貪腐感知（與組內平均之差）	-0.35 ⁺	(0.21)	-0.15*** (0.03)	-0.40 ⁺	(0.21)	
政治效能感						
政治效能感（組內平均）				0.19	(0.29)	
政治效能感（與組內平均之差）				-0.38	(0.23)	
控制變數						
性別（女性=0）						
男性	0.04	(0.23)	-0.08*** (0.02)	0.05	(0.23)	
年齡（20 至 39 歲=0）						
40 至 59 歲	1.00*** (0.27)	-0.02	(0.03)	1.00*** (0.27)		
60 歲以上	1.30*** (0.37)	0.02	(0.04)	1.29*** (0.37)		
教育程度（國中及以下=0）						
高中職	-0.89** (0.40)	0.07 ⁺	(0.04)	-0.89* (0.40)		
大專院校及以上	-0.76 ⁺ (0.40)	0.18*** (0.04)	-0.80* (0.40)			
政黨偏好（無偏好=0）						
泛綠政黨（組內平均）	2.10*** (0.40)	0.24*** (0.04)	2.05*** (0.40)			
泛綠政黨（與組內平均之差）	1.11** (0.35)	0.20*** (0.04)	1.18*** (0.35)			
泛藍政黨（組內平均）	1.23*** (0.37)	-0.09* (0.04)	1.23*** (0.37)			
泛藍政黨（與組內平均之差）	0.04 (0.36)	0.05 (0.04)	0.06 (0.36)			
其他政黨（組內平均）	0.88 (0.67)	0.03 (0.07)	0.89 (0.67)			
其他政黨（與組內平均之差）	0.42 (0.42)	0.19*** (0.05)	0.51 (0.42)			
截距 (constant)	2.97*** (0.75)	3.00*** (0.08)	2.38* (1.14)			
誤差結構成分						
sigma_u	2.34	0.23	0.27	-	2.33	0.23
sigma_e	-	-	0.45	-	-	-
rho	0.62	0.05	0.27	-	0.62	0.05
LR test of Ho: rho = 0		p < 0.001	-		p < 0.001	
模型統計值						
N		1228		1228		1228
Log Likelihood		-848.030		-		-846.464
Wald χ^2		67.82		325.60		69.98

$\text{Prob} > \chi^2$	< 0.001	< 0.001	<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資料庫（TIGCR-PPS2018-2020）。			
$^{***}p<0.001$, $^{**}p<0.01$, $^{*}p<0.05$, $^{+}p<0.1$			



在投票參與行為方面，根據模型 1 和模型 3 的分析結果，當公民的貪腐感知隨時間變化增加一單位，則其參與投票的機率將分別減少至原先參與投票機率的 $0.7 (= \exp(-0.35))$ 與 $0.67 (= \exp(-0.40))$ 倍。顯示貪腐感知會對公民的投票參與行為產生顯著負面影響，與本文研究假設 1 所預期的一致，說明當民眾隨著時間推移覺得公部門貪腐情況越來越嚴重時，會選擇不參與投票而非繼續以投票的方式影響政府，呼應了相關文獻指出當公民意識到貪腐嚴重程度上升，或是感知貪腐仍在持續發生時，會選擇退出投票參與而非繼續參與投票 (Carmo, 2018; Sousa & Bezerra, 2013; Kostadinova, 2009)。此外，本文第二章所歸納的實證研究成果也大多指出貪腐感知對於投票率有著顯著負面影響 (Chong et al., 2015; Giommoni, 2021; Hooghe & Quintelier, 2014; Školník, 2020; Stockemer et al., 2013)。

然而，貪腐感知的顯著負面影響僅在個體內部變化中存在(與組內平均之差)。貪腐感知的負面影響之所以僅在個體內部變化顯現出來，本文認為其中一種可能性與選民投票決策的效價 (valence) 觀點有關，也就是不同選民對於投票決策中重視政府廉潔性的程度存在較大的異質性，例如有些選民在投票時可能更在乎政黨認同，而非政府的廉潔性，這一觀點在本文的政黨偏好變數分析結果中也得到了佐證：相較於無政黨偏好的選民，當選民具有泛綠或泛藍陣營的政黨偏好時，他們更傾向參與投票。儘管效價觀點主要是用於解釋選民在投票對象的選擇上，但投票選擇與是否參與投票也存在一定關聯性 (Hainmueller et al., 2014)。在實證研究上，例如 Barros 等人 (2020) 也指出選民在投票時在面對貪腐和意識型態的抉擇時，選民更傾向投給貪腐但意識形態與自己更接近的候選人。

控制變數的分析結果顯示年齡、教育程度與政黨偏好，皆對公民是否參與投票



有著顯著影響。由於模型 1 與模型 3 在控制變數上的迴歸係數估計結果無明顯差異，因此以下以模型 1 的估計結果為準：在年齡方面，相對於青年人，中年人與老年人的參與投票機率分別約為 2.72 ($=\exp(1.00)$) 與 3.67 ($=\exp(1.30)$) 倍，這符合過去文獻的觀察結果，例如 Dalton (2008) 指出中老年人相較於年輕世代，在公民規範上更偏好義務規範認知，包含參與投票、遵守法規等面向；在教育程度方面，相比學歷為國中及以下者，學歷為高中職與大專院校以上者的參與投票機率分別約為 0.41 ($=\exp(-0.89)$) 與 0.47 倍；在政黨偏好方面，相比於無政黨傾向者，泛綠與泛藍政黨傾向者的投票機率分別約為 8.17 ($=\exp(2.10)$) 與 3.42 ($=\exp(1.23)$) 倍，且公民若隨著時間變化從無政黨偏好轉變為泛綠陣營，其投票機率將增加至原先的 3.03 倍 ($=\exp(1.11)$)，有政黨傾向者投票率較高，代表選民願意為了支持偏好的政黨出門投票，與理論和現實觀察情況相符。

模型 2 顯示不論在個體之間或個體內部變化，貪腐感知都會對民眾的政治效能感產生顯著負面影響，若公民的貪腐感知相較其他人高出一單位，則政治效能感將下降 0.25 單位，若公民隨時間變化貪腐感知增加一單位，則政治效能感將下降 0.15 單位，因此本文研究假設 2 成立，代表貪腐感知確實會減少民眾對政府回應性的信心。

綜合模型 1 與模型 2 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逐步迴歸分析中的分析步驟前兩步已經成立，也就是貪腐感知對於投票參與存在顯著負面影響，對於政治效能感也存在顯著負面影響，若模型 3 中政治效能感對於投票參與存在顯著影響，則政治效能感為解釋貪腐感知影響投票參與的重要機制。但根據模型 3 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貪腐感知對於投票參與仍維持顯著負面影響，但政治效能感並未對投票參與產生顯著影響，因此對於投票參與而言，貪腐感知對於投票參與的負面影響，政治效能感並非是重要的解釋機制，本文研究假設 3 與假設 4 均不成立。之所以中介效果不顯著，本文推測可能是由於投票為代議民主制度下的行為，因此選民在選



擇是否要參與投票時，是否能以自身的力量直接影響政府並非是其主要關注的焦點。此外，從理性選擇理論的角度來看，相比於其他公民參與形式，選民在投票時所需要付出的成本相對更少，因此其主觀上對於自身影響力大小的認知變化，也並非影響其實際公民參與行為的主要機制。

第二節 貪腐感知對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的影響

表 5-2 為貪腐感知對於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的中介效應分析結果，其中模型 4 至模型 6 均使用固定與隨機效果並用法進行分析。模型 4 透過分析貪腐感知對於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的影響，並且先不加入中介變數政治效能感，以檢驗貪腐感知影響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的總效果（路徑 c ），模型 5 則是檢驗貪腐感知對於政治效能感的影響（路徑 a ），模型 6 則是放入所有變數，檢驗是否存在顯著的間接效果（路徑 b ），以及貪腐感知影響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的直接效果是否顯著（路徑 c' ）。若路徑 a 與路徑 b 迴歸係數均顯著，則代表政治效能感為中介變數成立。

表 5-2 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的固定與隨機效果並用法之中介效應分析結果

	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Y；貪腐感知=X；政治效能感=M					
	(4) X → Y		(5) X → M		(6) X → M → Y	
	$\hat{\beta}$	(S.E.)	$\hat{\beta}$	(S.E.)	$\hat{\beta}$	(S.E.)
貪腐感知						
貪腐感知（組內平均）	-0.31	(0.20)	-0.27*** (0.03)	-0.22	(0.22)	
貪腐感知（與組內平均之差）	-0.21*** (0.06)		-0.11*** (0.02)	-0.18** (0.06)		
政治效能感						
政治效能感（組內平均）				0.15	(0.21)	
政治效能感（與組內平均之差）				0.35*** (0.07)		
控制變數						
性別（女性=0）						
男性	-0.07	(0.18)	-0.07** (0.02)	-0.03	(0.19)	
年齡（20 至 39 歲=0）						
40 至 59 歲	0.45** (0.16)		0.00 (0.03)	0.47** (0.16)		
60 歲以上	0.22 (0.21)		0.06 ⁺ (0.03)	0.22 (0.21)		
教育程度（國中及以下=0）						
高中職	0.28 (0.28)		0.06 ⁺ (0.03)	0.19 (0.28)		
大專院校及以上	0.00 (0.26)		0.19*** (0.03)	0.06 (0.26)		
政黨偏好（無偏好=0）						
泛綠政黨（組內平均）	0.79** (0.29)		0.25*** (0.03)	0.73* (0.29)		
泛綠政黨（與組內平均之差）	0.06 (0.11)		0.16*** (0.03)	0.00 (0.11)		
泛藍政黨（組內平均）	0.70* (0.31)		-0.07 ⁺ (0.04)	0.71* (0.31)		
泛藍政黨（與組內平均之差）	0.07 (0.10)		0.06 ⁺ (0.03)	0.07 (0.10)		
其他政黨（組內平均）	2.36*** (0.60)		0.02 (0.07)	2.27*** (0.60)		
其他政黨（與組內平均之差）	0.02 (0.12)		0.14*** (0.04)	-0.12 (0.12)		
截距 (constant)	-0.92 (0.57)		3.02*** (0.07)	-1.51 ⁺ (0.91)		
誤差結構成分						
sigma_u	-	-	0.30	-	-	-
sigma_e	-	-	0.42	-	-	-
alpha; rho	9.13	0.68	0.34	-	9.02	0.67
LR test of Ho: alpha = 0		P < 0.001		-		P < 0.001
模型統計值						
N		1228		1228		1228
Log Likelihood		-3027.345		-		-3012.442
Wald χ^2		40.96		397.12		70.07

Prob > χ^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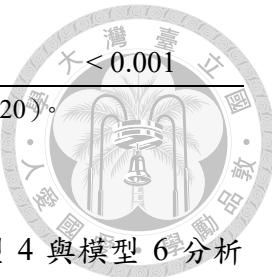
< 0.001

< 0.001

<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資料庫（TIGCR-PPS2018-2020）。

***p<0.001, **p<0.01, *p<0.05, +p<0.1



在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行為上，與研究假設預期一致，模型 4 與模型 6 分析

結果顯示貪腐感知確實會顯著降低公民的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行為，而貪腐感知的顯著負面影響存在於個體內部變化（與組內平均之差）。根據模型 4 與模型 6 的分析結果，若公民的貪腐感知隨時間變化上升一單位，則其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次數將分別下降至原先的 0.81($=\exp(-0.21)$) 與 0.84 倍 ($=\exp(-0.18)$)，代表當選民感知到貪腐情況越來越嚴重，會選擇退出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此結果與既有實證研究結果一致 (Bazurli & Portos, 2019; Hooghe & Quintelier, 2014; Olsson, 2014)，本文研究假設 1 成立。貪腐感知的負面影響僅顯現於在個體的內部變化，本文認為這可能是源於個人在選擇是否進行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時，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當沒有控制住這些因素時，則會難以觀察到貪腐感知在個體之間的真實影響。舉例而言，假設關心環境保育議題而參與相關行動的公民，由於環保議題與政府營建和採購等容易滋生貪腐的政策領域更加密切，因此貪腐感知對參與次數的影響會相對更明顯，而關注性別平權領域的公民受到貪腐感知的負面影響則相對輕微，此時在模型分析上若沒有控制住參與議題的變數，則可能無法捕捉到貪腐感知在個體間的真實影響。

在控制變數方面，顯著影響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的變數則出現在年齡與政黨偏好上，由於模型 4 與模型 6 在控制變數上的迴歸係數估計結果無明顯差異，因此以下以模型 4 的估計結果為準：在年齡方面，相對於青年人，中年人的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次數約為 1.57 ($=\exp(0.45)$) 倍，代表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和激進的集會遊行等並不等價，因為理論上青年人在集會遊行等參與場域會更加活躍；在政黨偏好方面，相比於無政黨傾向者，泛綠、泛藍與其他政黨傾向者的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次數分別約為 2.2 ($=\exp(0.79)$)、2.01 ($=\exp(0.70)$) 與 10.59 ($=\exp(2.36)$) 倍，偏好



其他政黨者的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期望次數明顯居冠，本文認為這是因為在選舉制度較不利於小黨，因此小黨的支持者相較於兩大黨陣營的支持者，會更偏好投票參與以外的參與管道。

模型 5 顯示不論在個體之間或個體內部變化，貪腐感知都會對民眾的政治效能感產生顯著負面影響，若公民的貪腐感知相較其他人高出一單位，則政治效能感將下降 0.27 單位，若公民隨時間變化貪腐感知增加一單位，則政治效能感將下降 0.11 單位，本文研究假設 2 成立。綜合模型 4 與模型 5 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逐步迴歸分析中的分析步驟前兩步已經成立，也就是貪腐感知對於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存在顯著負面影響，對於政治效能感也存在顯著負面影響，若模型 6 中政治效能感對於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存在顯著影響，則政治效能感為解釋貪腐感知影響投票參與的重要機制。

模型 6 顯示政治效能感對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為顯著正面影響，若公民的政治效能感隨時間變化增加一單位，則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次數增加為原先的 1.42 倍 ($=\exp(0.35)$)，同時貪腐感知對於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也維持顯著負面影響，因此可以推論存在部分中介效果，政治效能感為解釋貪腐感知對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的重要機制之一，本文研究假設 3 與假設 4 成立。此分析結果一方面顯示政治效能感是解釋影響機制的關鍵因素，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國民眾在決定是否進行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時，會考量政府的回應性以評估自身是否能影響政府，並非單純抒發情緒或表達意見，而這種審慎評估的過程也使得民眾在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上更容易被貪腐感知所影響。

第三節 貪腐感知對兩種公民參與行為的影響機制差異

比較表 5-1 與表 5-2 對於投票參與與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的分析結果，最主要



的共同之處在於貪腐感知均對兩者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且貪腐感知也都會顯著影響政治效能感。但是，政治效能感作為解釋貪腐感知影響公民參與的重要機制，本文的實證結果顯示在投票參與上則並不成立，僅在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上得到支持。

本文認為政治效能感之所以無法解釋貪腐感知對於投票參與的負面影響機制，原因在於政治效能感並未對投票參與行為產生顯著的影響，這可能是由於參與投票為代議民主下的行為，投票的目的為選出理想的官員和代議士，而非特別針對某項公共議題以自身的力量直接影響政府，而投票相對於其他公民參與行為，公民自身要付出的時間和資源也更少一些，因此公民在選擇是否參與投票行為時，自身對於政府的影響力可能並非其關心的焦點。相比投票參與，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為公民試圖在某個公共議題領域中，以更直接的方式使用自身的力量去影響政府。在這個過程中，公民會更重視政府的回應性，因為這決定了政府在特定議題上是否會因為自己的行動而改變。因此，貪腐感知對於公民參與的負面影響，政治效能感是否為背後的重要機制，只有在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上才得以凸顯出來。

在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方面，本文認為並不能將貪腐感知的負面影響歸因於我國系統性貪腐已經根深蒂固，導致民眾無力改變現狀。因為不論是國際評鑑還是資料中的貪腐感知變化趨勢，都指出我國的貪腐情況並未嚴重到民眾難以透過參與改變現狀的程度，且民眾的貪腐感知也正在逐漸下降，且如果民眾皆受到貪腐感知影響，導致出現疏離政治參與場域的情況，那麼本文實證模型應該會顯示貪腐感知越高的個人，其公民參與程度相對其他人會更低，但本文實證結果顯示貪腐感知的顯著負面影響只存在於個人內部變化。

因此，本文認為應該以 Bauhr 與 Grimes (2014) 提出的公民參與良性循環模型的角度進行思考：若民眾因為接收到貪腐資訊而使其貪腐感知升高，同時他在公民



參與方面的知識和能力卻沒有進步，在這種情況下，相對於貪腐感知升高之前，民眾更可能會誤認為目前現有的參與管道無法達到影響政府的效果，最終導致民眾離開公民參與的場域。正如本文前揭所述，公民參與的良性循環要能夠順利運作，就必須符合兩項條件：民眾在貪腐感知升高後仍願意透過公民參與影響政府，以及民眾的公民參與行動確實有達到改變政府的效果。前者代表民眾在參與之前就先放棄參與行動，其原因不一定是由於貪腐問題實際上變得更嚴重，也可能是因為透明度改革等措施使民眾更容易接觸到貪腐資訊，但民眾的公民參與能力又尚未被培養起來所出現的現象；後者則是民眾參與之後發現無法改變政府，通常代表國家內部存在嚴重的系統性貪腐問題，以至於民眾缺乏有效的參與管道改變現狀。本文認為我國的情況應屬於前者，因此政府在進行廉政改革之時，也應該注意賦權培力的政策是否有跟上，如此才能避免民眾在參與之前就因為貪腐感知增加而打退堂鼓，達到廉政與促參政策相輔相成的效果。

此外，本文分析結果也顯示政黨偏好不論在投票參與或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上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偏好泛綠與泛藍兩大陣營政黨者，在選舉與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上都明顯高於無政黨偏好者，而偏好泛綠陣營的民眾而言不論在個體間或個體內部變化皆是如此。兩種政治參與的政黨偏好影響的差異主要在於其他政黨偏好者上，對於偏好其他政黨的公民，在投票參與上並未顯著高於無政黨偏好者，但是在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上卻明顯高於無政黨偏好者，以及兩大陣營政黨偏好者，其原因可能為小黨本身在選舉中較難取得優勢，因此偏好小黨者在參與投票上的動力可能不如兩大黨的支持者，而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是以直接民主的方式影響政府，相對而言較不會遭遇代議民主上的不利情境，因此其他政黨支持者的參與熱情會相對更高。



第四節 不同貪腐感知變化群的人口特徵分析

本文分析結果顯示若個人的貪腐感知隨時間增加，將對其投票參與與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產生負面影響，而除了探討貪腐感知的影響以外，本文將進一步分析 2018 至 2020 年，貪腐感知的不同變化趨勢對應哪些人口特徵的群體。

2020 減去 2018 年的受訪者貪腐感知差值從 -3 至 3 共分為 7 種變化程度，其中 -3 者為 1 人（占 0.08%）、-2 者為 22 人（占 1.79%）、-1 者為 241 人（占 19.63%）、0 者為 800 人（占 65.15%）、1 者為 154 人（占 12.54%）、2 者為 9 人（占 0.73%），以及 3 者為 1 人（占 0.08%）。由於大部分樣本都集中於 -1 至 1 之間，因此本文將 -3 至 -1 者歸類為「貪腐感知下降者」（占 21.5%）、將 0 者歸類為「貪腐感知不變者」（占 65.15%），並將 1 至 3 者歸類為「貪腐感知上升者」（占 13.36%）。並將歸類群體與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政黨傾向進行卡方檢定。

在性別方面，男性與女性的貪腐感知下降趨勢占比均大於上升趨勢，儘管男性貪腐感知上升趨勢的比例較女性稍高一些，但卡方檢定結果顯示性別與貪腐感知變化趨勢並無統計上顯著關聯，如表 6-1 所示：

表 6-1 性別與貪腐感知變化趨勢卡方檢定

		貪腐感知變化分類			總和	
		下降	不變	上升		
性別	男性	個數	146	446	100	692
	女性	集群所占比例	21.10%	64.45%	14.45%	100.00%
總和	女性	個數	118	354	64	536
	總和	集群所占比例	22.01%	66.04%	11.94%	100.00%
統計值		$\chi^2 = 1.66$; df = 2; p-value > 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資料庫 (TIGCR-PPS2018-2020)。



在年齡方面，所有年齡段的貪腐感知下降趨勢占比均大於上升趨勢，而中年人相比青年人與老年人，其貪腐感知維持不變的比例最高，顯示其貪腐感知變化相較其他年齡段更加穩定。如表 6-2 所示。

表 6-2 年齡與貪腐感知變化趨勢卡方檢定

			貪腐感知變化分類			總和
			下降	不變	上升	
年齡	青年(20-39 歲)	個數	116	303	74	493
	族群所占比例		23.53%	61.46%	15.01%	100.00%
年齡	中年(40-59 歲)	個數	89	338	50	477
	族群所占比例		18.66%	70.86%	10.48%	100.00%
年齡	老年(60 歲 以上)	個數	59	159	40	258
	族群所占比例		22.87%	61.63%	15.50%	100.00%
總和		個數	264	800	164	1228
		族群所占比例	21.50%	65.15%	13.36%	100.00%
統計值		X ² = 11.72; df = 4; p-value < 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資料庫 (TIGCR-PPS2018-2020)。

在教育程度方面，三種教育程度的貪腐感知下降趨勢占比均大於上升趨勢，儘管國中及以下者上升趨勢的比例最高，但其下降比例也是最高的。卡方檢定結果顯示教育程度與貪腐感知變化趨勢並無統計上顯著關聯，如表 6-3 所示：

表 6-3 教育程度與貪腐感知變化趨勢卡方檢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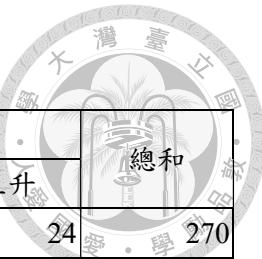


			貪腐感知變化分類			總和
			下降	不變	上升	
教育程度	國中及 以下	個數	55	142	35	232
		集群所占比例	23.71%	61.21%	15.09%	100.00%
	高中職	個數	74	232	48	477
		集群所占比例	20.90%	65.54%	13.56%	100.00%
	大專院 校	個數	135	426	81	258
		集群所占比例	21.03%	66.36%	12.62%	100.00%
	總和	個數	264	800	164	1228
		集群所占比例	21.50%	65.15%	13.36%	100.00%
統計值		$X^2 = 2.15; df = 4; p\text{-value} > 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資料庫 (TIGCR-PPS2018-2020)。

在政黨傾向方面，不論是泛綠、泛藍、其他政黨或無政黨傾向者，其貪腐感知下降趨勢占比均大於上升趨勢，值得注意的是泛綠陣營者的貪腐感知上升趨勢占比明顯低於泛藍陣營與無政黨傾向者，維持不變者的占比也高於泛藍陣營與無政黨傾向者，顯示民眾的貪腐感知變化深受其政黨傾向所影響。以上發現也符合莊文忠等人(2017)指出個人對政府的清廉評價，會受到其個人政黨偏好與所處環境脈絡的影響，支持執政黨的民眾相比於其他政黨傾向或持中立態度的民眾，更容易在政府清廉度方面作出正面評價。本文的研究發現也顯示個人政黨偏好確實會顯著影響其貪腐感知的變化，政黨偏好為泛綠陣營的民眾在 2018 至 2020 年三年間認為貪腐情況變嚴重者的比率明顯低於其他政黨偏好群體。

表 6-4 政黨傾向與貪腐感知變化趨勢卡方檢定



			貪腐感知變化分類			總和 270
			下降	不變	上升	
政黨傾向	泛綠	個數	47	199	24	270
		集群所占比例	17.41%	73.70%	8.89%	100.00%
	泛藍	個數	67	197	47	311
		集群所占比例	21.54%	63.34%	15.11%	100.00%
	其他政黨	個數	10	30	4	44
		集群所占比例	22.73%	68.18%	9.09%	100.00%
	無政黨傾向	個數	140	374	89	603
		集群所占比例	23.22%	62.02%	14.76%	100.00%
統計值		X ² = 13.36; df = 6; p-value < 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資料庫（TIGCR-PPS2018-2020）。

綜上所述，針對人口特徵與貪腐容忍度變化趨勢進行卡方檢定的結果與本文表 4-1 的結果基本相符，各群體都呈現貪腐感知下降趨勢均大於上升趨勢。而綜觀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政黨傾向，其中政黨傾向與貪腐感知變化趨勢的關係更為密切，即使本文的貪腐感知測量題組為針對基層公務員而非政治人物，也出現了執政黨支持者的貪腐感知上升占比明顯低於其他政黨支持者的現象，顯示在進行貪腐感知的相關研究時，政黨傾向的內生性問題是值得注意的重點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泛藍陣營者的貪腐感知變化幾乎與無政黨傾向者一致，顯示在調查中回答無政黨傾向者，其對於政府的貪腐感知可能與泛藍陣營者具有相似之處，或是在調查中因認為政黨傾向較為敏感而選擇隱藏其政黨傾向。



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章首先從理論及實務面向總結本文的研究結果意涵和貢獻。在研究意涵方面，總結貪腐感知對於公民參與的負面影響，以及政治效能感如何作為該影響背後的運作機制，並說明這些研究結果的理論意涵，以及如何對應民主治理的概念；在研究貢獻上，理論方面包含既有實證研究缺口、資料的寶貴性和探索影響機制的意義，實務方面則說明研究結果如何凸顯廉政政策對於公民參與的重要性。最後，本文進一步闡述在本研究面臨的限制，以及在本研究基礎上未來可再進一步拓展的研究方向，包含進一步探索影響機制的可能性，以及針對類型繁多的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行為進行更細膩的分析。

第一節 理論與實務意涵

在推行民主政治的過程中，建立廉潔而有效的治理為實現公共行政中善治的關鍵，落實廉能治理不僅可以確保政府的合法性，也使公民願意相信政府會傾聽民眾的聲音：當政府被視為廉潔且可信賴時，人民更有信心並願意參與公共事務，並相信政府會對其關切和需求做出回應 (Verba, 1996)。因此透過建立良好的廉政制度，使人民認為政府的貪腐情況獲得改善，才能建立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互信關係，並提升治理的效能和公信力。這將為公共參與和民主治理奠定堅實基礎，有助於推動社會的良好發展和可持續治理目標的實現 (Carmo, 2018; Dahlberg & Solevid, 2016)。

我國自民主轉型的三十餘年以來，黑金政治始終都是民主治理的威脅。對於民主鞏固和深化而言，人民是否願意加入投票參與和其他更廣泛的公民參與之中至關重要，但如果民眾認為政府受黑道與財團操弄把持，除了傷害人民與政府的互信之外，也會減損民眾在公民參與上的意願，一旦民眾不願意花費精力投入公民參與，

無法發揮民眾的課責力量抑制貪腐並維持政府的回應性，則民主體制的治理優勢將蕩然無存，使治理品質陷入難以逃脫的惡性循環 (Bauhr & Grimes, 2014)。

本文從對於現實中我國民眾在公民參與和貪腐感知的變化趨勢切入，並結合民主治理中廉政與貪腐感知相關文獻，指出不論在理論或實證研究上，民眾的貪腐感知都與其是否願意投入公民參與，以及選擇以何種形式進行公民參與有著密切關聯。貪腐情況嚴重與否為治理品質的重要衡量指標，而民主治理的重要優勢便是當公民對於現況不滿時，可以透過公民參與對政府進行課責，以形塑廉潔且有回應性的政府 (Carothers & Young, 2015)。本文以固定與隨機效果並用法分析我國 2018 至 2020 年的定群追蹤資料，從公民參與的角度觀察貪腐感知對於民主治理的威脅，在分析上同時考慮民眾對政府貪腐情形的認知、政治效能感以及公民參與（包括投票參與及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透過深入了解這些因素之間的關係，為民主治理提供有價值的實證基礎。本文研究發現可歸納如下：

第一，民眾在這段時間內對於政府清廉度評價及政治效能感有逐年上升的趨勢。

第二，當民眾的貪腐感知隨時間變化增加時，對於投票參與和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行為均會產生負面影響。

第三，不論在個體間還是在個體內不同年度的變化上，貪腐感知對於政治效能感皆有顯著的負面影響。

第四，政治效能感是否為貪腐感知影響公民參與的重要解釋機制，在投票參與與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上存在明顯差異：對於投票參與而言，政治效能感並非是重要的解釋機制，顯示貪腐感知對於投票參與和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的影響存在機制上的差異。

第五，民眾貪腐感知的變化深受其政黨偏好影響，泛綠陣營政黨支持者的



貪腐感知上升幅度，相較其他政黨傾向與無政黨傾向者更低。

四點研究結論所對應的理論和實務意涵分別如下：結論一的研究發現顯示我國民眾的貪腐感知逐年下降與政治效能感逐年上升趨勢，顯示政府推動廉政與促參政策的成效；結論二則說明貪腐感知確實對於公民參與產生負面影響，正如 Bauhr 與 Grimes (2014) 所言，民主治理下公民參與的良性循環並非絕對穩固，除了廉潔的客觀環境以外，還需要民眾的主觀認知進行配合，當公民察覺到政治環境貪汙腐敗時，不一定會選擇透過公民參與改變現狀，民眾可能會選擇加入在貪腐的制度之中，或是因感到無力改變現狀而選擇疏遠公民參與的場域 (Carmo, 2018; Kostadinova, 2009; Sousa & Bezerra, 2013)。Sousa 與 Bezerra (2013) 等學者也強調若民眾覺得透過投票等民參與形式也無法改變系統性的廣泛貪腐，則民眾就不會有動力對貪腐的政府或政治人物進行譴責。此外，個體之間貪腐感知對於投票參與與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的影響皆不顯著，投票參與方面可能是民眾在投票參與的決策上尚須考慮政黨或候選人形象，或是效價上的權衡評估 (Barros et al., 2020; Hainmueller et al., 2014)，而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方面則是可能除了貪腐感知以外，民眾選擇是否參與還需要考量社會結構、動員機構和文化態度等諸多因素 (Norris, 2002; Rosenstone & Hansen, 1993; Verba et al., 1995)；結論三則說明腐感知會對個人的政治效能感造成負面影響，也就是對個人的價值觀和民主信念層面造成負面影響，公民會因為貪腐感知上升而減少對政府回應性的信心，並認為自己無法透過公民參與發揮影響力，此研究發現符合理論和現實觀察的結果 (Anderson & Tverdova, 2003; Canache & Allison, 2005; Seligson, 2002)；結論四則說明對於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而言，貪腐感知所產生的負面影響的確有一部分是經由降低政治效能感所達成的，這說明民眾在進行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時，主觀上認為自己是否能夠透過公民參與影響政府的認知，對其是否採取公民參與實際行動相當重要，而對於投票參與而言，政治效能感卻不是重要的機制之一，顯示在代議民主下，由於民



眾是以選票選出心儀的代表，並非試圖以自己的力量直接影響政府，因此在投票參與上政治效能感的重要性難以和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相提並論 (Kostadinova, 2009; Olsson, 2014)；結論五則顯示對於個人的政黨偏好會顯著影響其對於政府貪腐情形的判斷，執政黨的支持者認為政府貪腐程度上升的比例明顯較低，這一發現也與我國過去相關研究結果一致，顯示民眾對政府清廉度評價的變化深受其政黨偏好的影響（莊文忠等人，2017）。

綜上所述，本文從探討貪腐感知對於公民參與的影響出發，說明其對於民主治理研究的重要性，並進一步闡述為何政治效能感為該影響重要的解釋機制，最後使用我國在 2018 至 2020 年的定群追蹤資料驗證研究假設，透過分析同一個體不同時間段在貪腐感知、政治效能感和公民參與的差異，揭示貪腐感知是如何從公民參與的角度對民主治理造成威脅。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從廉政的角度，更全面地探討民眾選擇是否投入公民參與的決策過程，並未否定既有促參政策的重要性，本文認為要使民眾不因貪腐感知而減少公民參與，除了改善廉政環境以外，讓民眾在接收到貪腐資訊後，知道有哪些參與管道可以改變現狀，並對公民參與管道的有效性抱持信心也相當地重要，而這方面要仰賴政府積極推動公民參與方面的政策宣導和賦權培力政策。透過廉政和促參政策的雙管齊下，才能維持健全的公民參與環境。以下本文將闡述研究成果對於理論和實務上的貢獻，並說明本文在研究過程中所面臨的研究挑戰及未來可行的研究拓展方向。

第二節 研究貢獻

在 2018 至 2020 這段時間，我國從中央民意代表到地方首長的弊案陸續爆發，同時也經歷了民粹主義的崛起，以及在集會遊行等公民參與上發生劇烈變化，種種因素引起社會上對於民主倒退現象的討論。為了探討我國在這段期間是否

面臨貪腐感知所帶來的民主治理危機，因此本文就貪腐感知對公民參與的影響展開研究。此外，本研究使用國內罕見的長期追蹤資料，而非常見的跨斷面研究資料。
因此本研究對於民主治理研究上的貢獻主要包含以下幾方面：



第一，從國際上相關實證研究來看，儘管有相當多的研究指出貪腐因素會嚴重傷害民主治理的品質，包括但不限於資源分配、政治績效和公民參與等方面，但從公民參與的角度觀察貪腐對於治理的威脅仍需要更多的關注，尤其是那些在投票參與之外的公民參與行為。儘管這些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被視為是彌補代議政治不足之處的重要參與，但其在實證研究上受到的關注與其重要性仍不成比例，除了少數較大規模的跨國研究以外，研究範圍大多只侷限在東歐與南美等貪腐情況較為嚴重且民主發展程度也較低的開發中國家 (Bazurli & Portos, 2019; Stockemer, 2016)。而藉由對我國近年的資料進行分析，能夠觀察到即使是在廉政、政治權力和公民自由表現優異的國家，民眾對政府廉潔性的不信任仍會從公民參與的角度傷害民主治理，削弱民主政治的治理優勢。

第二，從研究資料上來看，本文使用寶貴的定群追蹤資料進行分析，這不論在國內外相關實證文獻上都是相當罕見的。定群追蹤資料中包含同一群人在不同時間點的感知、態度和行為的變化，因此本文得以使用固定與隨機效果並用法分析個體間與個體內差異，而非只能像大多數橫斷面研究一樣分析個體之間的差異。本文研究結果顯示使用定群追蹤資料分析貪腐感知對公民參與的影響有其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民眾在決定是否投入公民參與上會受到相當多因素的影響，因此難以觀察到個體之間受貪腐感知影響的差異，但是透過分析同一個體在不同時間的變化，本文發現個人是否投入公民參與會受其貪腐感知隨時間變化的影響，其它相關實證文獻幾乎都無法觀察到此種現象，更不會提到貪腐感知對公民參與若無顯著影響可能是由於橫斷面研究的限制。此外，這些資料涵蓋了 2018 年至 2020 年的定群追蹤年度，相對於我國其他公民參與研究多以 2016 年之前的資料為主，使用的



更近期資料能夠有效填補我國公民參與研究方面的實證研究缺口，同時也展示了我國在 2018 至 2020 年民心思變的動盪背景下，貪腐感知對於民眾在公民參與決策上仍為重要的影響因素。

第三，大多數相關實證研究只驗證貪腐感知是否會影響公民參與，而本文在驗證貪腐感知的確會對其在投票參與和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造成負面影響之後，為了更深刻理解其負面影響是如何產生的，以及比較投票參與和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之間的負面影響機制是否存在差異，因此將與公民參與密切相關的政治態度因素政治效能感作為中介變數加入研究框架中。研究結果說明政治效能感的確是其中重要的機制，代表貪腐感知的負面影響是透過損害民眾在民主方面的價值觀產生的，也就是不認為自己能夠對政府發揮影響力，進而不想透過自身的力量促進社會改變。這種損害並非體現在如理性選擇理論所述的利弊衡量上，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個人主觀認知與態度的重要性，而非一味強調客觀的貪腐環境對於公民參與的負面影響。此外，與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相反，政治效能感並非是貪腐感知影響投票參與的重要機制，也點出研究貪腐感知對於公民參與的影響時，應該注意不同公民參與之間的差異不僅僅存在於貪腐感知的影響方向之上。

除了對於相關理論與實證研究的貢獻之外，本文對於實務上的貢獻主要可以體現在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如何制定促進公民參與的方法。過去推動公民參與的政策主要集中在政策行銷和賦權培力等範疇，相對缺乏從廉政肅貪的角度出發的研究，以探討影響民眾是否願意參與公民參與的根本問題。這個問題關乎除了參與能力和參與渠道之外，還有其他影響民眾進入公民參與領域的根本因素。正如公民志願主義參與模式(CVM)指出公民不願意參與公民參與的場域有三大面向的原因：他們不能、他們不想，以及沒有人要求他們參與(Verba et al., 1995)。過去相關政策主要關注「他們不能」這一面向的因素，著重於探討如何提升個人參與能力。然而，本文實證研究結果證實在「他們不想」這一面向上，民眾對貪腐的感知是他們



不願意參與公民參與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一發現也凸顯了廉政肅貪政策的重要性，因為當民眾認為政府是廉潔的，會更願意投入公民參與，進而帶動公民參與的良性循環。

因此，從廉政宣導與教育的角度進行思考，如何讓民眾認識到許多時候我國的貪腐情況並非難以改變，投入公民參與監督課責發揮影響力改變現況是有意義且能改變現狀的。¹³因此，本研究結果對於政策制定和實踐上來說具有重要的倡議意義，呼籲加強廉政肅貪措施，以提升公民參與的動機和意願。

第三節 研究檢討與未來展望

本文透過分析定群追蹤資料，得以在我國的社會脈絡下初窺貪腐對於公民參與的影響。但使用定群追蹤資料進行分析時，會面臨許多相關的研究限制，例如在調查公民參與行為上受訪者可能存在過度回答 (over-reporting) 的情況，選民可能由於社會期待等因素而沒有據實回答其真實行為 (Belli et al., 2001)，或是本身願意接受定群追蹤訪問者其投票率也高於一般人的平均水準，本文圖 5-1 也顯示出受訪者投票率高於全國母體平均；而在定群追蹤調查中，追蹤損耗 (panel attrition) 所導致的樣本人口結構變化也是研究限制之一，本文在分析資料時注意到人口特徵為男性、較年輕者、受教育程度更高者、有政黨傾向者會更願意參與定群追蹤訪問。以上研究限制均為定群追蹤分析上經常面臨的限制，讀者在解讀相關研究成果時可更加謹慎留意這些方面。

而在貪腐相關研究常見的限制方面，正如莊文忠與余致力 (2017) 指出貪腐現

¹³ 舉例而言，苗栗縣龍昇村坤輿掩埋場在建置過程中多次規避環境評估，且縣議員與苗栗縣環保局都因此深陷賄賂弊案之中，如果當時龍昇村居民因為得知政府的貪腐情況而導致退出抗爭掩埋場建置的公民參與行動，如今可能掩埋場附近的水源都會面臨嚴重的汙染問題，影響居民的生活品質。



象在測量上相當複雜且難以窮盡，衍伸到貪腐感知的測量上也同樣如此，有些學者們在研究貪腐感知對公民參與的影響時，也同樣注意到了這個現象¹，並嘗試透過變數設計等研究方法讓實證結果更加細膩，例如 Kostadinova 與 Kmetty (2019) 在選擇貪腐因素的測量指標時，同時採取三種測量方式作為衡量貪腐的依據，包含個人貪腐經驗、對於貪腐嚴重程度的主觀評價，以及對於貪腐現象增長幅度的主觀感知。本文由於分析資料題項有限，因此在貪腐感知的測量上僅選擇民眾是否認為需要賄賂官僚才能順利辦事的印象，儘管收受紅包在我國的社會背景下是相當具有代表性的貪腐行為，但如果能夠納入更多面向的貪腐感知，能夠有效增進研究在測量概念上的效度。此外，貪腐研究的另一個挑戰是貪腐主觀測量題項具有一定隱私性與敏感性，因此經常會需要面對項目無反應的情形，儘管本文題項為假設性的情境，降低題項敏感性的疑慮，但本文在分析 2018 至 2020 年皆有參與調查者的數據時，仍發現約有一百多人不願意回答貪腐感知題項，這些個體因而被排除在分析之外。

在未來的研究方向上，可以再針對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行為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探討貪腐感知對於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的負面影響，具體發生在哪些類型的參與形式上。舉例而言，Kostadinova 與 Kmetty (2019) 則認為貪腐感知對於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的影響存在異質性，因此將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分為體制內的制度化參與，以及未獲政府授權更激進的非制度化參與，透過對體制內外的參與形式進行更細緻地分析，可以更清楚的觀察到民眾是不再投入任何形式的公民參與，抑或是退出體制內的參與場域並轉向以更激烈的手段進行抗爭。因此，在未來在研究設計上還可以再進一步區分公民參與的形式，思考不同參與形式對於民主治理的意涵差異，以更深入了解貪腐對於不同參與形式的影響差異。

其次，貪腐的客觀環境與主觀認知有何交互作用也是值得關注的議題，尤其在跨大研究範圍進行跨國研究時更加重要。例如 Dahlberg 與 Solevid (2016) 使用跨國數據研究貪腐如何影響個人投票行為時，除了個人的貪腐感知之外，同時將各國



的 CPI 分數作為衡量該國的系統性貪腐的指標，其研究結果發現貪腐感知確實會降低投票率，但此種負面影響並不會出現在系統性貪腐最嚴重的國家，Dahlberg 與 Solevid (2016) 推測這可能是由於在貪腐最嚴重的國家中，個人的投票行為已經深受客觀環境限制，因此個人的主觀感知並不會顯著影響其投票行為。未來進行相關研究時，可多加鑽研客觀環境脈絡的因素。

最後，本文實證結果顯示在貪腐感知影響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中，政治效能感為其中重要的影響機制，但統計結果說明政治效能感為部分中介效果，代表貪腐感知對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造成的影响並非完全只透過政治效能感產生，尚有挖掘其他影響機制的可能性，例如政治信任、對政治績效的評價、對公民參與風險的感知等。例如 Caillier (2010) 以民眾對政府解決問題的信心作為中介變數，分析貪腐感知是否透過此機制對公民參與產生負面影響。藉由探索貪腐感知的影響機制，除了能夠在理論上更加深入地了解貪腐因素究竟是透過何種心理機制對公民的行為產生影響，而能夠使得相關政治的制定者能夠據此制定對應政策，消除貪腐因素在公民參與方面對於民主治理的產生的不利影響。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中選會，2020，〈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概況表、第 10 屆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 民 立 法 委 員 選 舉 概 況 表 〉，
<https://web.cec.gov.tw/central/cms/109news/32427>，瀏覽日期：2022/12/28。

王己由，2017/10/10，〈賄貪故鄉？屏東 1／3 鄉鎮市長涉弊〉，中時新聞網，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1010000201-260118?chdtv>，瀏覽日期：2022/12/29。

吳重禮、湯京平、黃紀，1999，〈我國政治功效意識測量之初探〉，《選舉研究》，6(2)：23-44。

余一鳴，2012，〈從個人貪腐到組織腐化的歷程探索－以 Bandura 的道德疏離理論為分析架構〉，《臺灣民主季刊》，9(2)：1-38。

余致力，2006，〈倡廉反貪與民主治理〉，《臺灣民主季刊》，3(3)：165-175。

余致力、方凱弘、蘇毓昌，2018，〈貪腐為何難以界定？Q 方法論在廉政研究之應用〉，《行政暨政策學報》，67：39-78。

何明修，2004，〈政治機會結構與社會運動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37：33-80。

周思廷、郭銘峰、林水波，2021，〈貪腐關乎性別？性別刻板印象影響廉能治理之初探〉，《東吳政治學報》，35(3)：41-99。

林向愷，2008，〈貪腐與民主〉，《臺灣民主季刊》，5(3)：167-176。

林宗弘、韓佳，2008，〈政治貪腐的制度理論：以亞洲各國為例的分析〉，《台灣政治學刊》，12(1)：53-99。



林孟潔、王宏舜、王聖藜，2022/07/15，〈扁珍國務機要費 16 年審不完 弊案始末大事記看這裡！〉，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7321/6462894>，瀏覽日期：2022/12/29。

林長順，2022/07/06，〈立委涉貪案 蘇震清廖國棟陳超明徐永明判 7 年 4 個月至 10 年〉，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2207065002.aspx>，瀏覽日期：2022/12/29。

呂欣芷，2021/10/27，〈不只三中案！盤點馬英九涉 4 大弊案 最終均全身而退〉，TVBS 新聞網，<https://news.tvbs.com.tw/politics/1618897>，瀏覽日期：2022/12/29。

沈如峰，2022/02/23，〈涉嫌貪瀆 林姿妙與女兒、宜縣府農業處長遭聲押禁見〉，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202230012.aspx>，瀏覽日期：2022/12/29。

胡佛，1985，〈台灣地區民眾的參與行為：結構、類型與模式的比較分析〉，《第四次社會科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363-397。

俞振華、翁定暉，2017，〈影響台灣民眾政治參與的因素：從公民規範認知的觀點出發〉，《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38：9-56。

徐明莉、莊文忠，2020，〈臺灣民眾的公民意識與公民參與〉，《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2(3)：333-366。

郭銘峰、王鼎銘，2014，〈小泉執政時期眾參兩院選舉之定群追蹤分析：固定與隨機效果並用法之應用〉，《選舉研究》，21(1)：127-167。

郭銘峰、徐子傑，2022，〈貪腐感知、政治效能感與公民參與：一項定群追蹤資料的分析〉，中國政治學會 2022 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東華大學。

郭銘峰、蔣林秀、黃心怡，2023，〈妥協的集體與貪婪的個人：透明、課責與反貪的交織效果〉，《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5(2)：1-53。

陶宏麟、邱于恆，2019，〈貪腐容忍的性別差異〉，《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42：83-123。



- 陳敦源、蔡秀涓，〈國家發展的倫理基礎：反貪腐與公職人員倫理準則〉，《臺灣民主季刊》，3(3)：185-199。
- 陳俊明、莊文忠、徐明莉，2017，〈106 年廉政民意調查 第一階段調查報告：民眾對廉政認知評價與訊息來源〉，法務部廉政署委託研究案。臺北市：廉政署。
- 陳俊明、莊文忠、徐明莉，2018，〈107 年度廉政民意調查報告〉，法務部廉政署委託研究案。臺北市：廉政署。
- 陳俊明、莊文忠、徐明莉，2019，〈108 年度廉政民意調查〉，法務部廉政署委託研究案。臺北市：廉政署。
- 陳俊明、莊文忠、郭宗城，2020，〈109 年度廉政民意調查〉，法務部廉政署委託研究案。臺北市：廉政署。
- 陳俊明、莊文忠、郭宗城，2021，〈110 年度廉政民意調查〉，法務部廉政署委託研究案。臺北市：廉政署。
- 莊文忠，2010，〈台灣民眾公民意識的變化：2008 年政權二次輪替前後的比較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2(2)：201-246。
- 莊文忠、余致力，2017，〈貪腐容忍度的類型化建構：內在與外在效度的評估〉，《行政暨政策學報》，64：37-67。
- 莊文忠、徐明莉、黃東益、李仲彬，2017，〈政黨認同如何影響民眾對政府清廉的評價〉，《東吳政治學報》，35(1)：93-141。
- 黃東益、莊文忠、李仲彬、徐明莉、彭婉柔、黃筱芸、吳曜竹，2011，〈民眾對於政府清廉感受之成因分析〉（報告編號：RDEC-TPG-100-003），行政院研考會委託研究報告。臺北市：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 游清鑫、蔡佳泓，2009，《選舉預測》，臺北：五南。
- 黃信豪，2006，〈政治功效意識的行動效果(1998-2003)〉，《臺灣民主季刊》，3(2)：119-158。
- 溫嘉楷，2018/09/25，〈炒股案被判刑 8 個月 傅崐萁今入監服刑〉，公視新聞網，<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07514>，瀏覽日期：2022/12/29。



- 廉政署，2022a，〈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https://www.aac.moj.gov.tw/6398/6436/6438/6456/900536/951449/post>，瀏覽日期：2022/12/29。
- 廉政署，2022b，〈地方檢察署偵辦列管貪瀆案件起訴案件〉，<https://www.aac.moj.gov.tw/6398/6666/6688/6692/Lpsimplelist>，瀏覽日期：2022/12/29。
- 廖興中、呂佩安，2013，〈臺灣縣市政府貪腐現象之空間自相關分析〉，《臺灣民主季刊》，10(2)：39-72。
- 廖興中，2014，〈全球貪腐傳染之空間分析：以世界銀行貪腐控制指數為例〉，《公共行政學報》，46：1-28。
- 廖興中、徐明莉，2017，〈臺灣地方政府貪腐現象之時空掃描〉，《公共行政學報》，53：1-23。
- 廖興中，2018，〈全球各國貪腐與電子治理發展之關係：空間異質性的初探〉，《台灣政治學刊》，22(1)：89-141。
- 趙永茂，2018，《社會代議的崛起：臺灣政治與社會的平行發展》，台北：翰蘆。
- 鄭夙芬，2014，〈候選人因素與投票抉擇－以2012年臺灣總統選舉為例〉，《臺灣民主季刊》，11(1)：103-151。
- 劉嘉薇、黃紀，2012，〈父母政黨偏好組合對大學生政黨偏好之影響-定群追蹤之研究〉，《臺灣民主季刊》，9(3)：37-84。
- 劉嘉薇，2014，〈民眾政黨認同、媒介選擇與紅衫軍政治運動參與〉，《政治學報》，58：101-126。
- 蔡佳泓，2001，〈解析台灣選民的投票參與〉，《選舉研究》，8(2)：125-154。
- 蔡佳泓，2008，〈反貪倒扁運動的支持度之多層次貝式定理分析〉，《政治學報》，45：67-93。
- 蕭怡靖，2019，〈台灣民眾的黨性極化及其對民主態度的影響〉，《台灣政治學刊》，23(2)：41-85。
- 蘇毓昌、胡龍騰，2013，〈誰能容忍貪腐？〉，《臺灣民主季刊》，10(2)：1-38。

警政統計查詢網，〈處理集會遊行概況〉，
<https://ba.npa.gov.tw/npa/stmain.jsp?sys=100>，瀏覽日期：2022/12/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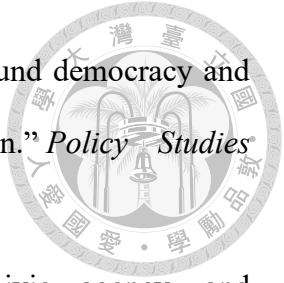


二、外文文獻

- Abramson, P. R. & Aldrich, J. H. 1982. "The decline of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6(3): 502-521.
- Adler, R. P., & Goggin, J. 2005. "What do we mean by "civic engagement"??" *Journal of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 3(3): 236-253.
- Agerberg, M. 2019. "The curse of knowledge? Education, corruption, and politics." *Political Behavior*, 41(2): 369-399.
- Aldrich, J. H. 1993. "Rational choice and turnou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1): 246-278.
- Allison, P. D. 2009. *Fixed Effects Regression Models*. Los Angeles : SAGE publications.
- Amundsen, I. (Ed.). 2019. *Political corruption in Africa: Extraction and power preservation*.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Anderson, C. J. & Tverdova, Y. V. 2003. "Corruption, political allegiances, and attitudes toward government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7(1): 91-109.
- Bäck, H., & Hadenius, A. 2008. "Democracy and state capacity: exploring a J-shaped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21(1): 1-24.
- Baron, R. M., &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6): 1173-1182.
- Barnes, S. H., & Kaase, M. 1979. *Political Action: Mass Participation in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Bazurli, R. & Portos, M. 2019. "Crook!: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corruption on non-electoral forms of political behaviou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2(2): 245-260.
- Barros, L., Goldszmidt, R., & Pereira, C. 2020. "Why do voters choose corrupt candidates? The role of ideology on cognitive mechanis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32(4): 676-692.
- Bauhr, M., & Grimes, M. 2014. "Indignation or resignation: The implications of transparency for societal accountability." *Governance*, 27(2): 291-320.
- Bauhr, M., & Charron, N. 2018. "Insider or outsider? Grand corruption and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1(4): 415-446.
- Belli, R. F., Traugott, M. W., & Beckmann, M. N. 2001. "What leads to voting overreports? Contrasts of overreporters to validated voters and admitted nonvoters in the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Journal of Official Statistics*, 17(4): 479-498.
- Berger, B. 2009. "Political theory,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end of civic engagement."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7(2): 335-350.
- Bernburg, J. 2015. "Economic crisis and popular protest in Iceland, January 2009: The role of perceived economic loss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in protest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 *Mobilization*, 20(2): 231–252.
- Bermeo, N. 2016. "On democratic backsliding." *Journal of Democracy*, 27(1): 5-19.
- Beyerle, S. M. 2014. *Curtailing Corruption: People Power for Accountability and Justice*.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 Biswas, B. & Vijaya, R. M. 2018. "Who protests? An exploration of the class dimensions of anticorruption mobilization." *Governance*, 32(6): 639-655.
- Blake, C. H., & Martin, C. G. 2006.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corruption: Re-examining the influence of democracy." *Democratisation*, 13(1): 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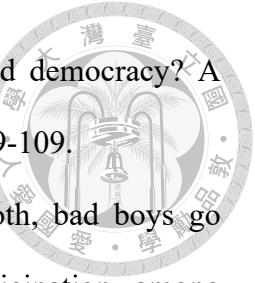
- Bohra, A. K., Mitchell, N. J., & Mittendorff, C. F. 2004. "Compound democracy and the control of corruption: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Policy Studies Journal*, 32(4): 481-499.
- Boyte, H. C. 2005. "Reframing democracy: Governance, civic agency, and politic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5(5): 536–546.
- Burns, N., Schlozman, K. L., & Verba, S. 1997. "The public consequences of private inequality: family life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2): 373-389.
- Caiden, Gerald. E. 2001. "Corruption and governance." In G. Caiden, O. P. Dwivedi, and J. Jabbra (eds.), *Where Corruption Lives*. Bloomfield, CT: Kumarian Press, 15-37.
- Caillier, J. 2010. "Citizen trust,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voting behavior: Connecting the dots." *Politics & Policy*, 38(5): 1015-1035.
- Campbell, Angus, Gerald Gurin, and Warren E. Miller 1954. *The Voter Decides*.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 Canache, D., & Allison, M. E. 2005. "Perceptions of political corruption in Latin American democracies."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47(3): 91-111.
- Carreras, M., & İrepoğlu, Y. 2013. "Trust in elections, vote buying, and turnout in Latin America." *Electoral Studies*, 32(4): 609-619.
- Carothers, T., & Youngs, R. 2015. *The Complexities of Global Protests* (Vol. 8).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 Carreras, M., & Vera, S. 2018. "Do corrupt politicians mobilize or demobilize voters? A vignette experiment in Colombia."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60(3): 77-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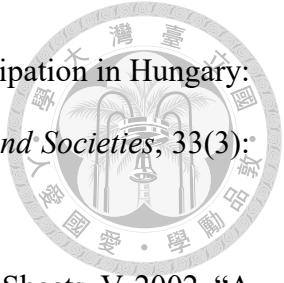
- Carmo, A. R. D. 2018. "Turkeys do not vote for Christmas. The Brazilian anti-vote-buying law." *Comparative Southeast European Studies*, 66(3): 325-348.
- Chong, A., De La O, A. L., Karlan, D., & Wantchekon, L. 2015. "Does corruption information inspire the fight or quash the hope? A field experiment in Mexico on voter turnout, choice, and party identifica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7(1): 55-71.
- Cordero, G., & Blais, A. 2017. "Is a corrupt government totally unacceptabl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40(4): 645-662.
- Dahlberg, S., & Solevid, M. 2016. "Does corruption suppress voter turnout?." *Journal of Elections, Public Opinion and Parties*, 26(4): 489-510.
- De Vries, C. E., & Solaz, H. 2017.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corrupt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 391-408.
- Donovan, T., & Karp, J. 2017. "Electoral rules, corruption, inequality and evaluations of democrac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56(3): 469-486.
- Ekman, J., & Amnå, E. 2012.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civic engagement: Towards a new typology." *Human Affairs*, 22: 283-300.
- Feddersen, T. J., & Pesendorfer, W. 1996. "The swing voter's curs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3): 408-424.
- Ferraz, C., & Finan, F. 2008. "Exposing corrupt politicians: the effects of Brazil's publicly released audits on electoral outcom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2): 703-745.
- Fernández-Vázquez, P., Barberá, P., & Rivero, G. 2016. "Rooting out corruption or rooting for corruption? The heterogeneous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scandals."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4(2): 379-397.



- Finkel, S. E., Muller, E. N., & Opp, K. D. 1989. "Personal Influence, Collective Rationality, and Mass Political A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3(3): 885-903.
- Foa, R. S., & Mounk, Y. 2019. "Democratic Deconsolidation in Developed Democracies, 1995-2018." CES Open Forum Series 2018-2019.
- Freedom House. 2021. Freedom in the World 2022: Taiwan.
<https://freedomhouse.org/country/taiwan/freedom-world/2022>. Retrieved December 5, 2022.
- Galeotti, F., & Zizzo, D. J. 2018. "Identifying voter preferences: The trade-off between honesty and competenc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05: 27-50.
- Giommoni, T. 2021. "Exposure to 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Italian municipalit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8, 102000.
<https://doi.org/10.1016/j.ejpoleco.2021.10200>
- Goetgeluk, S., & Vansteelandt, S. 2008. "Conditional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s for the analysis of clustered and longitudinal data." *Biometrics*, 64(3): 772-780.
- Hayes, A.F. 2017.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Hainmueller, J., Hopkins, D. J., & Yamamoto, T., 2014. "Causal inference in conjoint analysis: Understanding multidimensional choices via stated preference experiments." *Political Analysis*, 22(1): 1-30.
- Heidenheimer, Arnold J. 1970. *Political Corruption: Readings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N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Heidenheimer, Arnold J. 1989. "Perspectives on the Perception of Corruption" , in A. J. Heidenheimer, M Johnston and V. T. LeVine (eds.), *Political Corruption: A Handbook*,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49-163.



- Heidenheimer, Arnold J. 2004. "Disjunctions between corruption and democracy? A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42(1): 99-109.
- Hooghe, M., & Stolle, D. 2004. "Good girls go to the polling booth, bad boys go everywhe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anticipat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ong American fourteen-year-olds." *Women & Politics*, 26(3-4): 1-23.
- Hooghe, M., & Marien, S. 2013.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political trust and form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Europe." *European Societies*, 15(1): 1-22.
- Hooghe, M., & Quintelier, E. 2014.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European countries: The effect of authoritarian rule, corruption, lack of good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ownturn."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12: 209-232.
- Huntington, S.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Hsiao, C. 2022. *Analysis of Panel Data: Fourth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ncerti, T. 2020. "Corruption information and vote share: A meta-analysis and lessons for experimental desig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4(3): 761-774.
- James, L. R., & Brett, J. M. 1984. "Mediators, moderators, and tests for medi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69(2): 307-321.
- Klašnja, M., Tucker, J. A., & Deegan-Krause, K. 2016. "Pocketbook vs. sociotropic corruption voting."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6(1): 67-94.
- Kostadinova, T. 2009. "Abstain or rebe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and voting in East European elections." *Politics & Policy*, 37(4): 691-714.



- Kostadinova, T., & Kmetty, Z. 2019. “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Hungary: Testing models of civic engagement.”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33(3): 555-578.
- MacKinnon, D. P., Lockwood, C. M., Hoffman, J. M., West, S. G., & Sheets, V. 2002. “A comparison of methods to test mediation and other intervening variable effects.” *Psychological Methods*, 7(1): 83–104.
- MacKinnon, D. P., Fairchild, A. J., & Fritz, M. S. 2007. “Mediation analysi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8: 593-614.
- Machado, F., Scartascini, C., & Tommasi, M. 2011.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street protests in Latin America.”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5(3): 340–365.
- Malmberg, F. G., & Christensen, H. S. 2021. “Voting women, protesting men: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corruption, gender,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s & Policy*, 49(1): 126-161.
- Marien, S., Hooghe, M., & Quintelier, E. 2010. “Inequalities in non-institutionalised form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25 countries.” *Political Studies*, 58(1): 187–213.
- Michels, A. 2011. “Innovations in democratic governance: how does citizen participation contribute to a better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77(2): 275-293.
- Min, J. 2013. “The influence of scandal on vote intention during Korean presidential campaigns: Why do voters support the “corrupt” candidate?.” *Asian Survey*, 53(2): 393-422.
- Montinola, G. R., & Jackman, R. W. 2002. “Sources of corruption: A cross-country stud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2(1): 147-170.
- Monyake, M. & Hough, D. 2019. “Citizens, bribery and the propensity to protes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Commonwealth Politics, 57(3): 282-302.

Muñoz, J., Anduiza, E., & Gallego, A. 2016. "Why do voters forgive corrupt mayors? Implicit exchange, credibility of information and clean alternatives." *Local Government Studies*, 42(4): 598-615.

Neuhaus, J. M., & Kalbfleisch, J. D. 1998. "Between-and within-cluster covariate effects in the analysis of clustered data." *Biometrics*, 54(2): 638-645.

Niemi, R. G., & Barkan, J. D. 1987. "Age and turnout in new electorates and peasant socie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2): 583-588.

Niemi, R. G., Craig, S. C. & Mattei, F. 1991. "Measuring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in the 1988 national election stud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4): 1407-1413.

Norris, P. 2002. *Democratic Phoenix: Reinventing Political Activ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unnally, J.C. and Bernstein, I.H. 1994. "The assessment of reliability." *Psychometric Theory*, 3: 248-292.

Oh, Y. & Lim, S. 2017. "Connecting a missing link between participation in 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political efficac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83(4): 694-716.

Olson, 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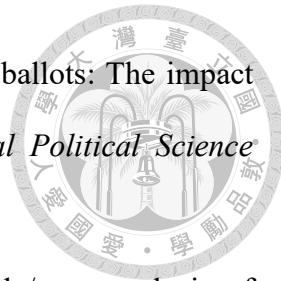
Olsson, S. A. 2014. "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multilevel analysis."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Institute (QoG) Working Paper Series*, 12: 1-53.

Pavão, N. 2018. "Corruption as the only option: The limits to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80(3): 996-1010.

Pereira, C., & Melo, M. A. 2015. "Reelecting corrupt incumbents in exchange for public goods: Rouba mas faz in Brazil."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50(4): 88-115.



- Pope, J., & Vogl, F. 2000. "Making anticorruption agencies more effective." *Finance & Development*, 37(2): 6-9.
- Pope, J. 2000. *Confronting Corruption: The Elements of a National Integrity System*. Germany, IL: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 Putnam, R. D. 1993.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The American Prospect*, 13: 36-42.
- Rosenstone, S. J., & Hansen, J. M. 1993. *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MacMillan.
- Seligson, M. A. 2002. "The impact of corruption on regime legitimac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ou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Journal of Politics*, 64(2): 408-433.
- Sjölander, A., Lichtenstein, P., Larsson, H., & Pawitan, Y. 2013. "Between-within models for survival analysis." *Statistics in Medicine*, 32(18): 3067-3076.
- Skelcher, C. & Torfing, J. 2010. "Improving democratic governance through institutional design: Civic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ownership in Europe." *Regulation & Governance*, 4(1): 71-91.
- Školník, M. 2020. "The effects of corruption on various form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lombia." *Latin American Policy*, 11(1): 88-102.
- Sousa, L. & Bezerra, M. M. 2013. "Why voters do not throw the rascals out?—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electoral punishment of corruption."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60(5): 471-502.
- Sobel, M. E. 1982. "Asymptotic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indirect effect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In S. Leinhardt (ed.),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290-312.



- Stockemer, D., LaMontagne, B. & Scruggs, L., 2013. "Bribes and ballots: The impact of corruption on voter turnout in democracie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4(1): 74-90.
- Stockemer, D. 2016. "What affects voter turnout? A review article/meta-analysis of aggregate research."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52(4): 698-722.
- Sunshine Hillygus, D. 2005. "The missing link: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Political Behavior*, 27: 25-47.
- Sundström, A. & Stockemer, D., 2015. "Regional variation in voter turnout in Europe: The impact of corruption perceptions." *Electoral Studies*, 40: 158-169.
- Tanzi, Vito. 1998. "Corruption around the world: Causes, consequences, scope, and cures." *Staff Papers*, 45(4): 559–594.
- Tolbert, C. J., & McNeal, R. S. 2003. "Unraveling the effects of the internet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6(2): 175-185.
-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21.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Taiwan.
<https://www.transparency.org/en/cpi/2021/index/twn>
- Weitz-Shapiro, R. 2008. "The local connection: Local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in Argent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1(3): 285-308.
- Wolfinger, R. E., & Rosenstone, S. J. 1980. *Who Vot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van Stekelenburg, J., & Klandermans, B. 2013.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test." *Current Sociology*, 61(5–6): 886–905.
- Verba, Sidney, Kay Lehman Schlozman, and Henry E. Brady. 1995.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Verba, S. 1996. "The citizen as respondent: Sample surveys and American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95."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0(1): 1–7.
- Zhang, Y., Kuo, M. F., Guo, J., & Wang, C. Y. 2019. "How do intrinsic motivations, work-related opportunities, and well-being shape bureaucratic corruptibilit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9(4): 552-564.
- Zhu, A. Y. F., Chan, A. L. S.& Chou, K. L. 2021.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youth after engaging in non-radical and radical political activities." *Current Psychology*, 41(11): 7843-7853.



附 錄 TIGCR-PPS 2018-2020 問卷內容及分析編碼

題號	投票參與題目
2019 PF1	<p>每逢選舉，有人會去投票；有人因為太忙或其他原因不去投票，也有人對投票完全不感興趣，也有人用不投票來表達意見。請您仔細回想一下，在去年（2018年）11月的地方選舉與公民投票，您有沒有去投票？</p> <p>01. 有投地方選舉，也有投公投票。 02. 有投地方選舉，但沒有投公投票。 03. 有投公投票，但沒有投地方選舉。 04. 原本要投票，但因為排隊太久，因此都沒有投票。 05. 原本要投票，但是看隊伍太長，因此沒有排隊投票。 06. 沒有出門投票。 91.忘記了；92.皆無投票權；94.皆投廢票；97.不知道；98.拒答。</p> <p>將有參與地方選舉者編碼為 1 (01-02)，其他選項 (03-06) 皆編碼為 0。</p>
2020 PH1	<p>每逢選舉，有人會去投票；有人因為太忙或其他原因不去投票，也有人對投票完全不感興趣，也有人用不投票來表達意見。請您仔細回想一下，在這次(2020年1月11日)的總統選舉以及立委選舉，您有沒有(台：咁有)去投票？</p> <p>01. 有。 02. 沒有。 91.忘記了；92.當時沒有投票權；97.不知道；98.拒答。</p> <p>將有參與總統大選者編碼為 1 (01)，其他選項 (02) 皆編碼為 0。</p>

非選舉式的公民參與題目	
2018 H1a	<p>請問您在最近一年中，參加像是環保、勞工、人權、年金改革這種的社會或公共議題相關的活動，次數有幾次？【訪員請補充：像是實際參加的，例如公聽會、遊行或抗爭，或是在網路連署的、或者是看直播的，都算】</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次</p>
2019 NH1 2020 NH1	<p>請問您在最近一年中，參加像是環保、勞工、人權、年金改革這種的社會或公共議題相關的活動，次數大概(台：差不多)有幾次？像是實際參加的，例如公聽會、遊行或抗爭，或是在網路連署的、或者是看直播的，都算。</p> <p>以下為 2019 NH1 選項：</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_____ 次 (超過 1000 次請填 995)</p> <p>9997. 不知道；9998. 拒答。</p> <p>以下為 2020 NH1 選項：</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_____ 次 (0-994 次)</p> <p>995. 超過 995 次。</p> <p>997. 不知道；998. 拒答。</p> <p>2019 年 NH1 有一筆觀察值為 995 次，考慮到該位受訪者在 2018 及 2020 年參與次數皆為 0 次，且 995 參與次數會嚴重影響 2019 年樣本整體參與次數的平均數與標準差，因此將其視為極端值排除在分析之外，其餘觀察值皆未更動數值。</p>
貪腐感知題目	
2018 B6 2019 PB6 2020 PB6	<p>有人說：「現在到政府機關辦事情，不送紅包很難辦得通（台：金歹辦）。」</p> <p>01. 非常同意；02. 同意；03. 不同意；04. 非常不同意。 94. 看情形；95. 無意見；97. 不知道；98. 拒答。</p> <p>由於分數越高代表貪腐感知越高在分析解釋上更為直觀，因此在此進行反向編碼 (01 = 4、02 = 3、03 = 2、04 = 1)。</p>



政治效能感題目（自身影響力）	
2018 B1 2019 PB1 2020 PB1	有人說：「我們一般民眾對政府的作為，沒有任何影響力。」 01. 非常同意；02. 同意；03. 不同意；04. 非常不同意。 94.看情形；95.無意見；97.不知道；98.拒答。
政治效能感題目（政府回應性）	
2018 B2 2019 PB2 2020 PB2	有人說：「政府官員不會在乎(台：不會睬)我們一般民眾的想法。」 01. 非常同意；02. 同意；03. 不同意；04. 非常不同意。 94.看情形；95.無意見；97.不知道；98.拒答。 政治效能感題項皆維持原始問卷編碼，政治效能感變數數值為同一受訪者在同一年度「自身影響力」與「政府回應性」兩題項回答取算數平均數得來。
性別題目	
2018 P1 2019 Z002 2020 Z002	受訪者的性別： 01. 男性；02. 女性。 男性編碼為 1，女性編碼為 0。
年齡題目	
2018 P2 2019 P1	請問您是民國幾年幾月出生的？ 以下為 2018 P2 選項： _____年 _____月；98.拒答。 以下為 2019 P1 選項： _____年 _____月；97.不知道；98.拒答。 年齡計算方式為以 107 減去受訪者回答民國年，並將年齡以 18-39 歲、40-59 歲與 60 歲以上分為三類，並以 18-39 歲作為參考組，將 40-59 歲與 60 歲以上各自編碼為 0 與 1 的虛擬變數。2019 年與 2020 年年齡計算方式為將 2018 年計算出的年齡分別加 1 與加 2，歸類方式同 2018 年。

教育程度題目	
2018 P7 2019 P6 2020 P3	<p>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什麼（台：您讀到什麼學校）？</p> <p>01. 無；02. 自修；03. 小學；04. 國(初)中；05. 初職； 06. 高中普通科；07. 高中職業科；08. 高職(高商、高工)； 09. 士官學校；10. 五專；11. 二專；12. 三專；13. 軍警專修班； 14. 軍警專科班；15. 空中行專；16. 空中大學； 17. 軍警官校或大學；18. 技術學院、科大；19. 大學； 20. 碩士；21. 博士。</p> <p>90.其他：_____ (請註明)；98.拒答。</p> <p>將無至初職（01-05）編碼為 1，代表國中及以下；將高中普通科至士官學校編碼為 2（06-09），代表高中職；將五專至博士編碼為 3（10-21），代表大專院校及以上。以國中及以下做為參考組，對高中職與大專院校分別建立 0 與 1 的虛擬變數。</p>
政黨偏好題目（是否有政黨偏好）	
2018 K1 2019 PJ1 2020 PM1	<p>在目前國內的政黨中，請問您有沒有（台：咁有）偏向哪一個政黨？</p> <p>01. 有（跳問 2018 K3、2019 PJ3、2020 PM3）。 02. 沒有（續問 2018 K2、2019 PJ2、2020 PM2）。 97.不知道；98.拒答。</p>
政黨偏好題目（續問是否有政黨偏好）	
2018 K2 2019 PJ2 2020 PM2	<p>那相對來說（台：那安撈比較起來），請問您有沒有稍微（台：咁有稍塊）偏向哪一個政黨？</p> <p>01. 有（續問 2018 K3、2019 PJ3、2020 PM3）。 02. 沒有（跳問其他題目）。 97.不知道；98.拒答。</p>

政黨偏好題目（偏好哪一個政黨）	
2018 K3 2019 PJ3 2020 PM3	<p>請問是哪一個政黨？</p> <p>以下為 2018 年 K3 選項：</p> <p>01. 國民黨；02. 民進黨；3. 新黨；04. 親民黨；06. 台聯； 07. 無黨團結聯盟；09. 綠黨；15. 人民民主陣線；18. 樹黨； 19. 時代力量；20. 社會民主黨；21. 民國黨；23. 軍公教聯盟黨； 24. 信心希望聯盟。 90. 其他政黨（請註明）_____；97. 不知道；98.拒答。</p> <p>以下為 2019 年 PJ3 選項：</p> <p>01. 國民黨；02. 民進黨；3. 新黨；04. 親民黨；06. 台聯； 07. 無黨團結聯盟；09. 綠黨；15. 人民民主陣線；18. 樹黨； 19. 時代力量；20. 社會民主黨；21. 民國黨；23. 軍公教聯盟黨； 50. 國會政黨聯盟。 90. 其他政黨（請註明）_____；97. 不知道；98.拒答。</p> <p>以下為 2020 年 PM3 選項：</p> <p>01. 國民黨；02. 民進黨；3. 新黨；04. 親民黨；05. 台澎黨； 06. 合一行動聯盟；07. 綠黨；08. 時代力量；09. 勞動黨； 10. 國會政黨聯盟；11. 台灣基進；12. 台灣民眾黨；13. 安定力量； 14. 一邊一國行動黨；15. 中華統一促進黨；16. 台灣團結聯盟； 17. 喜樂島聯盟；18. 台灣維新；19. 宗教聯盟；20. 社會民主黨； 90. 其他政黨（請註明）_____；97. 不知道；98.拒答。</p> <p>整合政黨偏好題項，在資料分析編碼上依據政黨傾向分為四個陣營：民進黨、台灣團結聯盟、基進黨、綠黨歸類為泛綠陣營政黨偏好，編碼為 1；國民黨、新黨、親民黨、民國黨、無黨團結聯盟歸類為泛藍陣營政黨偏好，編碼為 2；時代力量、台灣民眾黨、軍公教聯盟黨、社會民主黨、無色聯盟、宗教聯盟、歡樂無法黨歸類其他政黨偏好，編碼為 3；無政黨傾向者編碼為 4。以無政黨傾向者作為參考組，分別對泛綠、泛藍與其他政黨偏好建立 0 與 1 的虛擬變數，其餘未編碼的政黨則代表沒有受訪者的政黨偏好為該政黨，或是該政黨的支持者並未三年皆有填答問卷。</p>